

280011

年五十的鬥奮勇英

著 夫 米



行發社版出化文方北

年五十的鬥奮勇英

著 夫 米

版再月四年七廿國民華中

冊千五———號千二

英 勇 奮 鬥 的 十 五 年

每 冊 實 價 三 角

外 埠 加 郵 費

著 者 米

夫

校 對 者

攸 紀

麗 主

發 行 者 北 方 文 化 出 版 社

經 售 處 各 地 書 店

英勇奮鬥的十五年

米夫著

——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五週年紀念——

目錄

第一章 半殖民地的中國

一、一般的狀況

二、經濟之落後

三、帝國主義之束縛

第二章 歐戰後的中國

——中國共產黨之產生——

一、一九一九年之「五卅」運動

二、一九一九年之「五四」運動

三、偉大十月革命之影響

四、中國共產黨與職工會之形成

五、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六、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二日之華盛頓會議

第三章

- 七、香港海員大罷工
 - 八、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 九、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 十、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 十一、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 十二、革命根據地的廣州
 - 十三、北方政局之變化
 - 十四、孫中山之逝世
- 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中的中國共產黨
- 一、一九二五年之五卅事變
 - 二、上海五卅事變之發展
 - 三、香港大罷工
 - 四、一九二六年之三月廿號事變
 - 五、中國革命之性質與任務
 - 六、北伐
 - 七、羣衆運動之發展與統一戰線之破裂
 - 八、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中的路線
 - 九、共產國際在兩條戰線上的鬥爭

第四章 中國革命第二階段中的中國共產黨

- 一、革命中心的武漢
- 二、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三、武漢國民黨領袖之右傾與叛變
- 四、武漢時期中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與左傾
- 五、馬大林與中國革命
- 六、中國共產黨之「八一」會議
- 七、齊昌「八一」起義
- 八、廣州公廨

第五章 新革命高潮前的中國共產黨

- 一、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 二、南京國民黨之敗仗
- 三、中東路事件

第六章 新的革命高潮與爲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 一、工農運動之高漲
- 二、立三路線與四中全会
- 三、中國紅軍勢力之增長

四、日本之侵領東三省

五、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六、中國蘇維埃之土地政策

七、勞動法與文化建設

八、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九、福建事變

十、國民黨第六次開辦蘇區

第七章

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統一戰綫而鬥爭

一、日本帝國主義之有加無已的侵略

二、中國經濟之變本加厲的破產

三、民族解放鬥爭浪潮之洶湧高漲

四、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統一戰綫

五、中國蘇維埃在抗戰環境中的鬥爭

六、中國共產黨之政策

七、中國蘇維埃經濟政策之修改

八、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區域內的活動

九、中國共產黨底前途乃是勝利之旗幟

英勇奮鬥的十五年

米夫著

第一章 半殖民地的中國

一 一般的狀況

中國為一地大物博的國家，其幅員之廣大，僅次於蘇聯；全國面積約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超過全歐各國面積的總和；而其人口之衆多，則為任何國家所不及，總數約在四萬萬五千萬人以上。

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其中有偉大的思想家，有絕之軍事家及出色之發明家，有異常豐富的典籍文藝，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工業。遠在紀元前兩千年間，中國已有指南針的發明；而火藥的應用，亦遠在該人以前。二世紀時，即有紙張的出現；七世紀時，已有刻版印刷的發明，到十一世紀時，則更有活字印刷術的使用。其他如華美精緻的金屬品及光澤美觀經久的藥料，亦為中國自古著名的特產。而愛國熱忱及勤苦耐勞精神，尤為中華民族向來的特色。可是，中國確有如此顯著的優點，而現在却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

中國為一半殖民地的國家，其一般狀況即以此而定。偉大中國人民，備受帝國主義宰割與欺凌。千百萬勞動羣衆，備受國際帝國主義殘酷的剝削，其窮困飢餓，流離死亡的苦境，非筆墨所能形容。

國與帝國主義者爲鞏固其在華的統治，更多方維持和加強中國封建制度的殘餘，使幾萬萬農民羣衆處於水深火熱的地位。大部分土地，尤其是肥沃的土地，概由地主所佔有。封建地主之壓迫，苛刻佃租之繁重，軍閥苛捐雜稅之壓榨，高利貸借之盤剝，以及帝國主義之奴役及剝削，凡此種種，都使中國農民處於完全破產的地位。

二 經濟之落後

中國爲一土地豐富的國家，但極大部分土地，皆未加以利用，耕地僅佔總面積十分之一。當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宜於耕種，但是就適於耕種的土地而論，現有的耕地也不過佔有四分之一而已。而且耕種面積不僅未嘗增加，反在日益縮小中。很多田地，往往因河道不修，水利毀壞之故，日益化爲荒土。陷於破產之農民，無力經營，往往拋棄土地，流離四方。耕地之減少，遂成爲有加無已之趨勢。

中國爲一農業國家。但說也奇怪，本國糧食反不够供給，非從外國輸入不可。即以麥子而論，每年尚須輸入百分之八，方能糊口。中國雖本是一物產富庶的國家，但本國農產原料，尙不能供給本國不甚發達之麵粉製造業和紡紗業，非從外國輸入不可。

中國爲一資源極充足的國家，但天然財富的開發，則甚屬有限。如煤的蘊藏，幾乎遍地皆是，且極便於開採，總數共達九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但每年產煤總量，却不過二千八百萬噸。（其中有一千二百萬噸之煤，產於東三省與熱河境內）鐵蘊藏，多至十萬萬噸，但每年產鐵總量，却不過二百五十萬噸，而且，大半爲生鐵，並不用以發展本國

國民經濟，而是爲人作嫁，向日本輸出。

中國經濟落後之另一表現，則爲百分之八十五的棉紗，百分之四十的生絲，仍由舊式織機製造；用新式織機製造之棉織品，只佔國內所用棉布二分之一。就煤炭及鐵礦開採而論，由中國小企業用舊式方法開採之產量，亦在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左右。極稱豐富之資源，如水力（江河）石油，以及各種礦藏有色金屬等等，幾乎未能完全開發及採用。

中國人口雖佔全世界人口約四分之一，其天然富源，雖極稱豐富，然其各種生產在全世界生產總量中所佔比重，則非常薄弱。例如：

| | | | |
|----|---------|----|--------|
| 煤 | 百分之〇·六 | 鉛 | 百分之〇·一 |
| 鐵礦 | 百分之〇·五 | 錫 | 百分之五 |
| 銅 | 百分之〇·二二 | 紗錠 | 百分之三 |
| 生鐵 | 百分之〇·三五 | 生絲 | 百分之十五 |

從這些數字中，便可以明白看出中國工業落後的情形。

外國資本極力阻礙中國生產力之各方面的發展。可是，無論其阻礙作用如何，而中國資本主義關係却終於因國際帝國主義之侵入而隨着發展起來，中國工人階級亦隨着增長了。現在中國約有二百七十五萬大企業工人，而手工業工人及家庭工業工人則約達一千二百萬以上。中國工人階級已成爲一個強大的勢力了。在外國企業中，中國工人階級有其集中的部隊。極長的工作時間、最低微的工資、經常的失業、最受壓迫的地位，沒有任何勞動的保護，以及民族的壓迫——這就是中國工人所遭受的悲慘的命運。中國工人受着國際資本雙重

的壓迫，殘酷的剝削與民族的壓迫。正因為如此，所以正在中國全民解放運動中、中邊工人階級便成爲最團結的力量，成爲最堅定的最徹底的戰士。

三 帝國主義之束縛

國際帝國主義，既將中國一切經濟命脈攬爲己有，遂多方阻礙和紊亂中國經濟的發展。他們壟斷所有一切重要工廠企業，監督和管理中國的鐵路航運及空運、利用自己的銀行及其壓迫中國接受的借款來支配中國的財政，直接把持中國的關稅及鹽稅。帝國主義者，藉助中國本地的地主，高利貸者及商人，多方束縛中國農民羣衆，使其無法逃出他們的殘酷剝削的羅網。他們破壞中國向來極其重要的農作物——茶絲，使中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完全適合於帝國主義的利益。此外，他們又竭力維持和利用中國封建殘餘的勢力，使中國農村經濟陷入延綿不斷的危機。

除經濟的束縛外，國際帝國主義者，還對中國施行政治的統治，用砲艦手段奴役中國的人民；在中國人民自己的領土內任意殘殺中國人民。他們在用暴力奪去的中國領土內，即所謂「租借地」內，實行毫無限制的統制。他們是所謂「租界」裏的主人。他們在中國領域內自由招募自己的軍隊，施行所謂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總之，帝國主義者盡力削弱中國政治的獨立，將中國人民化爲備受凌辱之半殖民地奴隸。他們還極力培植和利用中國封建軍閥的割據局面，這就給中國人民造成絕對無法生存的形勢。

國際帝國主義之如此兇殘的壓迫與剝削，結果便引起中國人民之強有力的民族解放運動

。中國廣大的勞苦羣衆，日益深刻感到爲中國政治經濟的完全獨立而堅決鬥爭之必要。成千百萬民衆，便在推翻帝國主義統治與肅清封建殘餘口號之下而日益團結起來了。特別是歐戰以後，因俄國偉大十月革命勝利之影響，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最堅定徹底的戰士——走上中國政治鬥爭舞台的時候，這——民族解放運動便特別洶湧澎湃地發展起來了。

本冊以下各章，就要敘述中國民族革命解放運動在歐戰以後發展的經過，以及中國共產黨之產生和其發展的簡史。

第二章 歐戰後的中國

中國共產黨之產生

一 一九一九年之凡爾塞會議

當歐戰時，中國民衆具有很大的幻想，以爲協約國的勝利，即可解脫帝國主義對華的束縛，以爲在歐戰之後，不平等條約社會修改與廢除。大家知道，中國係參戰國，且係戰勝國之一。那末，在凡爾塞和平會議席上，要求歸還德國在山東所佔的各種權利與膠濟路及青島（在大戰中已爲日本所佔奪），無論如何是有充分理由的。同時，在凡爾塞會議之初，美國威爾遜總統亦曾聲言：「一俟國際聯盟機關成立，即將竭力贊助中國由半自主的國家變爲真正獨立的國家」。

但結果却適得其反，威爾遜之諾言，原來是不兌現的支票，而中國民衆之預期，不過是癡人的幻想。凡爾賽條約（一九一六——一九一八）完全贊成日本佔領中國領土的行動，明白規定所有德人在山東的一切權利概交日本接替。原來，凡爾賽會議，不僅是戰勝國掠奪戰敗國的會議，而且是帝國主義者公然利用中國的衰弱而實行更加瓜分與奴役中國的會議。

二一九一九年之「五四」運動

自凡爾賽和會侮辱中國民族之消息傳入中國以後，一時全國義憤如火如荼；各地廣大民衆，聞風奮起，反對簽訂凡爾賽條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安福系親日政府之賣國政策。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一萬五千學生舉行了壯烈的遊行示威，罵人東交民巷，向協約國駐華公使要求各國政府主持「公道」，同時復包圍政府機關及要人住宅，痛罵著名賣國漢奸——安福系內閣部長及外交官吏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

爲反抗北京親日政府的取銷與壓迫，北京各校當即一律宣佈罷課，組織學生會，廣大的開辦反日鬥爭與提倡抵制日貨運動（日本對華貿易，因抵制日貨結果，驟然減低百分之四十），中國資產階級內感覺日貨減少，大於華資有利，於是對於反日運動，特別是抵貨鬥爭，亦表示同情和贊成。另一方面，當時，特別是在五四運動初期，英美帝國主義者亦曾企圖利用學生反日運動，以削弱日本在華的勢力。但無論中國資產階級和英美帝國主義者有如何的企圖，反日運動的範圍終於日益擴大，鬥爭形式，亦日趨激烈；許多工業中心，都發生政治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以及工人罷工鬥爭，立即普及全國。羣衆遊行示威，更屬日益發

大。

安福系親日政府因迫於廣大羣衆運動之壓迫，終於不得不作相當之讓步，不得不拒絕簽訂掠奪中國的凡爾賽條約與接受學生羣衆罷免曹陸章的要求等。不久，安福系禍首段祺瑞亦因此離職。一九二〇年八月，北京直奉聯合政府宣告建立（直系當時爲英美帝國主義走狗，而奉系則爲日本帝國主義走狗），後因直系軍閥與勢力加強的結果，北京政權遂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完全轉入直系軍閥之手。

五四反日運動湧發之初，國民黨雖並未參與。孫中山氏領導之國民黨，雖有相當羣衆的影響，但其當時的組織與活動，尚多帶軍事陰謀的性質。因此，當學生會派遣代表赴粵直接求助於國民黨時，孫中山氏則藉口無能爲力而表示拒絕。

三 偉大十月革命之影響

俄國偉大十月革命之勝利，曾使中國反帝運動以極大的推動，開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民衆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鬥爭，也開闢一個新的紀元。牠使中國無產階級日益覺醒與團結，牠給了中國革命份子以思想的武器，使之相信自己勝利的前途，鼓舞他們去爲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而作出勇猛鬥爭，俄國紅軍之驅逐帝國主義干涉者與打破白黨軍閥的鬥爭，激發俄皇高蹠之弱小民族之澈底的解放，俄國蘇維埃政府之自動廢除俄皇時代對華一切不平等的掠奪條約——凡此種種，都使中國人民對俄國蘇維埃政府發生無限的同情和景仰。

固然，關於俄國革命事變的消息，並未及時傳到中國，高爾察克的白黨軍閥，捷克斯拉夫及日本帝國主義的干涉者，裁斷了中俄的聯系，約達一年半之久，直至紅軍驅逐帝國主義干涉者與消滅白黨之後，中國方得到關於蘇俄革命真實的消息。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對中國人民發表有歷史意義的宣言，宣佈取消俄皇時代奴役中國的一切秘密條約，蘇維埃政府放棄俄皇時代在華所攫奪的一切利益和特權，同時，俄國蘇維埃政府主張根據絕對的平等原則，與中國建立友誼的邦交。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蘇維埃政府復向中國政府重申高議，表示願以完全平等與尊重利益為基礎，迅速樹立中俄兩國友誼的關係。在這次宣言中，蘇維埃政府更加發揮了一九一九年宣言的原則，具體提出了協定談判的基本要點：蘇維埃政府重復聲明：「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政府，宣佈所有俄皇政府與中國訂立之合約為無效，放棄俄皇政府在中國所攫取的一切領土及租界，並無代價的永遠把俄皇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在中國所榨掠得來之一切利權交還中國」。

俄國蘇維埃政府兩次對華的宣言。在中國確實發生了深刻的影響，並備受中國先期人士之歡迎。愛帝國主義操縱的北京政府，曾竭力拒絕與蘇聯進行談判，直至一九二四年九月三十一日，北京政府才簽訂中蘇關於解決兩國一切懸案原則的協定。在這個協定中，完全反映出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兩次對華宣言中所持之原則。中蘇兩國以完全平等原則與真正友誼精神所簽訂的這一個條約，博得中國人民熱烈的擁護，因為這是中國與他國第一次按完全平等及真正友誼精神所簽訂的唯一條約。

四 中國共產黨與職工會之形成

自一九一九年起，中國罷工運動，有特別長足的進展。例如一九一八年參加罷工的人數僅六千五百人，而一九一九年，罷工人數（據不完全的統計），即達九萬一千五百人，而至一九二一年，罷工人數更達十萬八千人，在上海及其他各地都發生罷工運動，大多的日本企業，都進入罷工的潮流。工人的要求獲得部份的勝利，初期的工人組織亦開始發展起來，一九二〇年，上海職工會第一次在中國舉行了「五一」紀念。

同時，在中國進步的知識份子中；到處產生着各種名目的小組及團體，如「新潮」，「新青年」，「新中國」等。同時，新文化運動，也廣泛發展了；歐美的作品及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譯本，風行一時了；新的雜誌刊物，陸續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蘇俄問題討論會，工人夜校，俱樂部，政治訓練班等等，到處組織起來了。

一九二〇年初，由北大教授陳獨秀發起，在上海成立了共產主義的小組，參加者共七人。這一小組開始出版工人報紙，並進行職工會的組織。至一九二〇年夏，這一小組的組員人數在上海已增至五十四人。不久，在上海又成立了機器工會，印刷工會和紗廠工會。此外，與上海小組同時產生的尚有李大到張國燾等同志在北京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以及毛澤東等同志在湖南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陳代英，陳澤秋，董必武等同志在湖北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等。一九二〇年冬，在中國其他許多重要城市以及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中，也相繼成立共產主義的小組，最初，這些小組均帶着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性質。可是在這些小組內

，形成了和鍊鍛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批幹部。

五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一年七月，於上海召集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計十三人。大會代表不全係共產主義者，其中也有無政府主義份子，合法的馬克思主義份子，基督敎社會主義份子，以及暫時和偶然混入共產主義運動的同路人。提交大會討論的綱領。本來是很溫和的。可是有幾個代表則認爲太激進，因而發生很大的爭論，（特別是關於紀律，集中主義與共產黨最終目的問題）。但經過長時間討論以後，大會終於決定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並以組織工人奪取政權爲其最終的目的。

自中國共產黨最初成立之日起，在黨內就發生了嚴重的事件。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者」，立刻就分裂出去了；北京原有的共產主義小組僅餘二人；而在廣州方面，整個黨的小組，都完全操在無政府主義派手中了，只是經過一些時間以後，廣州方面的共產主義小組才又建立起來。同時，爲清洗本身隊伍起見，黨又開除了暫時附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自由派陳公博及紗季陶（不久以後，紗季陶便成了國民黨右派的思想家）。思想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則深受蘇聯勝利鬥爭的鼓勵，堅決爲有紀律的集中的布爾塞維克黨而奮鬥，爲革命的階級的工會運動而奮鬥。在上海由中國共產黨指導成立的勞動組合書記部，不久便成了中國工人運動的核心。當時，湖南的毛澤東同志（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方的李大釗同志（他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殺於北京），和張國燾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以及董必武同志（中華蘇維埃政府最高法院主席），陳澤秋同志（中華蘇維埃政府糧食人民委員部部长）等，在各地進行了特別努力的工作。當時國內一般政治環境，工人鬥爭的發展與反帝鬥爭的高漲，更加促進了中國共產黨工作的進步。

六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二日之華盛頓會議

蘇聯對中國民族革命運動迅速的增長，大大震動了國際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統治。同時，由於日本在華勢力的鞏固與不斷的伸展，使英國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在遠東的利益感受到直接的威脅。爲削弱日本在華勢力，爲向中國洶湧高漲的解放運動表示相當的讓步，爲對抗蘇聯影響的增長，以及爲保存中國人民對於美國資本在華「特殊」使命的幻想，美國乃發起召集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二日——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

出席華府會議的共有九國（英、美、法、意、日、荷、葡、中）。在此次會議上，美國達到了局部的勝利；英日同盟盟約廢除了，英日海軍軍備受到部分的限制，同時，日本不得不承認將青島歸還中國，並承認交回濟南鐵路，但中國須付以五千三百萬金馬克之代價。同時，華府會議並在原則上允許中國提高入口的關稅百分之二、五。但這一問題之最後解決，仍有待於召集特別的關稅會議。

在美國壓制之下，華盛頓會議承認對華維持「門戶開放」的原則。各國並有不許在華劃分勢力範圍之共同聲明。但很明顯的，無論英國或日本，在實際上都並未受華府會議諾言之

約束。而「門戶開放」的原則，不過僅是美國反對其競爭者的一種法實而已。美國在華並沒有如英日一樣的勢力範圍，所以牠不得不用經濟的力量或以外交的方法，來使中國服從自己的利益而完全變為帝國殖民地。美國因依靠於自己經濟的威力，採取比較巧妙的帝國主義政策，粉飾以自由主義的辭藻。

這就是華府會議的決議，在這些決議中對於中國有實際意義的，僅僅由山東撤退日軍一項而已；但這一決議並未妨礙今後日本帝國主義重新出兵山東或其他省份的行動。從中國人利益上看來，華府會議所給予中國的結果，殊屬可憐。而美帝國主義者則竭力吹噓其「恩惠」，以求鞏固其在中國人民中多年造成的幻想——以為美國資本是真正「贊助」中國的。雖然過去有許多人會渴望帝國主義列強對於中國的「援助」。但自凡爾賽會議和華盛頓會議以後，不滿與失望的心理日益普及中國更廣大的社會階層；而與一切帝國主義侵略政策正相反的蘇聯對華親善政策，更加速了這一轉變的過程。

中國無產階級首先打破了對於帝國主義列強「援助」的幻想。隨着工人組織的發展，無產階級日益堅定對於自身力量的信念，而在其鬥爭的痛苦經驗當中，更開始認清了中國解放運動的朋友和仇敵。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日益擴大的影響之下，日益擴大的罷工運動，歷經殘酷階級鬥爭的鍛鍊，而日益堅定走上為全民利益而鬥爭而革命的道路。

七 香港海員大罷工

最足以表示這點的，恰是在華府會議時期爆發了著名的反帝國主義的香港海員大罷工。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號，香港海員在李永徵同志領導之下（李徵同志當時雖未加入中共，但已爲香港海員所公認的領袖）宣佈偉大的罷工，以增加工資爲罷工主要的要求。至一月底，罷工人數，已達三萬以上。修泊香港而無法行駛的輪船，共達一百六十六隻（總噸數達二十八萬噸）。不久，罷工運動就擴大到其他的商業部門了。最初，罷工只帶經濟的性質，但很快就轉變成中國勞苦羣衆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了，當時孫中山氏之廣州政府，對於海員罷工表示了公開的援助，在中國南部中部以至全國各大城市裏，都舉行了募捐援助罷工工人的運動，香港政府出盡了各種壓迫工人的方法，以圖鎮壓工人的鬥爭，但因罷工工人堅持到底的結果，經過五十五日偉大的戰鬥後，香港政府及地主終於不得不與工人進行談判，並接受罷工工人的條件。在香港政府和地主三月五號所簽訂的條件中，實際上承認了海員工會（海員工會）的存在，允許增加工資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以及發給罷工期間一半的工資。香港海員英勇罷工的鬥爭，充分顯示有組織的工人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具有何等偉大的力量。中國勞動羣衆第一次偉大的反英帝國主義的勝利，顯然是整個中華民族勝利的表示。香港海員罷工的勝利，大大推動了中國工人運動與職工會組織的發展。

香港海員罷工之後，接續便發生了上海海員，紗廠，煙草及郵局工人的罷工，所有這些罷工，都獲得了勝利的結果。其他如漢口及鐵廠工人的罷工，安源一萬五千額上的罷工，亦均獲得勝利的成績。一九二二年八月，九，十，三個月內，中國各大鐵路工人亦相繼舉行了罷工。一九二二年五月一號，在廣州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更加促進了偉大工人運動的高漲。而中國共產黨底工作，亦在這個全國工人運動高漲中順利進展了。

八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參加大會的代表，共二十八人。大會決議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為其正式支部，並通過黨的政治行動綱領，在綱領中規定：（一）打倒封建軍閥；（二）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爭取中國民族和國家完全的獨立；（三）建立統一的聯邦民主共和國；（四）保障中國境內各民族——蒙回藏等的民族自決權；（五）爭取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罷工的自由，爭取普遍平等直接不記名選舉制；（六）爭取八小時工作制，以及其他各種改善工人生活的條件；（七）取消厘金及苛捐。稅，規定統一的所得稅及固定的包度租額；（八）力爭婦女平權及改良教育。在這一綱領中，以及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其他決議中，完全反映出黨在當時的弱點：尚未充分了解農民問題的偉大意義，沒有認識為爭取自己對農民的領導的必要。

在這一時期中，黨的基本工作，就是宣傳革命理論，組織職工會，首先是組織鐵路工人，海員以及紡織工人等等工會。同時，黨在青年羣衆中，也進行了極大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五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中國青年團在廣州舉行了第一次全國大會，當時，全國已有四千團員，黨在工人中間的影響，日益增長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已有幾十個職工會，會員人數，約在十五萬以上。中國工人經濟鬥爭與革命鬥爭的發展，使中國上層資產階級，封建軍閥，特別是國際帝國主義，驚怕萬分了。他們專等適當的時機，以圖打擊和摧殘革命的工人運動，結果便發生京漢鐵路「二七」流血的慘案。

九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自一九二二年十月起，資本家已開始向工人舉行進攻了。在這期中，上海紡織和煙草工人底罷工，遭受武力的壓迫，工會亦被解散。在極短的時期以內，單在上海即先後封閉了十一個工會。開採五畿四萬工人的大罷工，發生了兩次流血的事件，結果，開採工會同樣也遭受了慘殺。但最大的慘案，還是一九二三年二月流血的事件（著名的「二七」事件）。

京漢鐵路工人決定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鄭州舉行京漢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一月三十一號，軍閥吳佩孚命令禁止集會，調派軍警佔領工會，並實行逐次來到鄭州參加會議的代表，爲反對軍閥的強硬壓迫與摧殘，三司廳沙京漢路各站工會一致宣佈罷工。六號晚，駐漢各國領事與湖北軍閥及京漢鐵路當局，共同集議於漢口，決定以武力鎮壓罷工。於是二月七號在長辛店，鄭州，并許等處，軍警實行大批槍殺和逮捕罷工工人。反對復工者概遭殘殺毒打，工人組織亦被封閉。而在這，罷工鬥爭中，林祥 同志（京漢路工會江岸分會主席）和施洋同志（著名律師）之英勇行動尤爲顯著，並得全國各界民衆之稱贊，並成爲中國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鬥爭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二七」事件中，京漢鐵路罷工工人，雖極端堅定壯烈與一致的鬥爭，而「二七」的大罷工終於失敗了。但這一失敗中，中國無產階級取得了很大的教訓。流血慘案打破了工人對於吳佩孚的幻想，在「二七」之前，有些工人組織，相信吳佩孚之所謂「保護勞工」與贊助「勞動立法」的說話。而在「二七」之後，則每一個工人都明白看出，吳佩孚完全是帝

國主義忠實的走狗。中國工人在自己切身鬥爭經驗中，相信了自己的經濟鬥爭是不能不與政治鬥爭聯系的；是不能不與反對帝國主義及共產黨——中國軍閥——的鬥爭聯系的。同時，每個工人也更深刻感到，只有建立自己堅固的組織，方能爭得真正的自由與真正改善自己的生活。

十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二七〇以後，中國職工運動，表面上很沉寂，但實際上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職工會雖處於秘密狀態，仍繼續順利進行其在工人羣衆中的組織工作；並將全國各重要城市與商業中心的大部分工人，都組織起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在全國各地也有普遍的發展，黨員已增至四百人。黨已開始由小組——由黨的宣傳團體變成為對衆的政策。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一方面實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三年六月舉行於廣州。無論第二次代表會（一九二三年二月）的河滿擴大會議，都不能肯定解決關於反帝統一戰線與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而第三次代表大會，根據共產國際執委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的特別決議而解決了這一個問題。共產國際執委在決議中寫道：

「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他以民主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份學生和工人為依據。

因為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尚屬薄弱，因為中國目前的一切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

華代理人！——中國軍閥，尤其是因為解決民族革命問題，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現時工人階級又尚未充分分化成爲完全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爲：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是必要的。

共產國際一面就召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中工作，但同時又要求中國共產黨保持自己政治的組織的獨立性，而不應依附於任何其他政治派別：

「只要國民黨客觀上進行着正確的改革，中國共產黨就在民族革命戰線上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但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應與國民黨合併，無論如何不應在這些運動中，隱蔽自己特殊的旗幟」。

於決定國共合作問題中，第三次代表大會曾遇到「左」右傾份子的抵抗。「左」右傾份子輕視民族革命解放運動的意義，而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右傾份子則以爲實行國共合作，就是取消中國共產黨在民族革命中的獨立性與自己的政策。第三次代表大會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反對「左」右的傾向，且終於通過了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決議。大會決定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但同時完全保存在黨的組織及黨的政治獨立性。中國共產黨以變國民黨爲真正廣泛的民族革命羣衆組織，爲自己的重要任務。

此外，第三次代表大會又修改了黨的綱領。這個綱領比以前的綱領，更加擴大了關於推翻帝國主義統治與封建軍閥壓迫的要求。但不論舊的綱領或新的綱領，却都不曾提出農民羣衆的根本要求。而這一個缺點，是無特別指出的，因爲國際執委在其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特別的指示當中，曾着重指示：正確決定農民問題，具有第一等重要意義；並明白指

出土地革命的基本口號，首先就是「無代價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的口號。在該指示中說道：

「爲要發展民族革命與建立反帝戰線，就必須同時發展農民反封建殘餘的土地革命。祇有能够吸引中國農民基本政策——小農——參加運動，這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因此，中國共產黨——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就應力求工農聯盟的實現。而達到這一目的之唯一辦法，則祇有不倦的宣傳和實際上實現土地革命的口號；如沒收地主土地，沒收寺院廟宇的土地，無代價的交與農民；取消苛租，取消地行稅則，取消稅卡，取消包稅制，取消官僚制度，建立農民自治機關，以處理已被沒收之土地等等」（共產國際執委一九二三年五月給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

共產國際執委這一重要指示，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中，顯然沒有任何的反映。

十一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所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心問題就是黨底羣衆工作問題。此時共產黨員已經加入國民黨，並開始在國民黨內部發展自己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會對於黨底任務，會有確切的說明。大會經過了黨章以及關於總工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青年運動等問題的決議；這些決議除總結了工作經驗外，並規定改善今後黨底宣傳鼓動與組織工作的方針。關於應如何把反帝鬥爭與工農及小資產階級之日常的局部的爭取迫切利益的鬥爭配合起來的問題，大會亦有詳細的討論。第四次代表大會並着重指出工人階級

經濟鬥爭的重要說護。在決議中說道：

「忽略工人經濟鬥爭，不僅要使工人階級本身受到損害，而且必然要削弱民族解放運動」。在農民問題上，第四次代表大會所擬定農民部分要求的綱領中，將農民底部分要求提得太不充分，且未能與無代價的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的根本口號聯繫起來。這顯然是一個根本錯誤。其所以犯這一錯誤的主要原因，則是由於對中國革命階級有着不正確的了解。如第四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革命階級的提法中曾說：「在民族解放運動之一戰後階段之後，接着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一來，實際上，就把糧穀反帝革命並為反帝革命鞏固基礎的土地革命帶以，完全抹殺了。

第四次代表大會時，中國共產黨全國共有黨員約一千人。青年團員則約有九千人，青工佔百分之三十。其餘大部分則為七地「赤」分子，特別在熱河，中國共產黨在廣大勞動羣衆中的影響，日益發展。中國共產黨正逐步與成績，反映出中國革命運動迅速開展，而且成為革命勢力增長的標記。

十二 革命根據地的廣州

在第四次代表大會時，革命根據地的廣州已大大鞏固了。國民黨在過去幾年中，曾經過了不少嚴重的危機。在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實行倒戈（陳炯明曾為廣州國民政府主要軍事人物），他反對國民黨于預北方政府，他反對孫中山贊助蘇俄運動的政策。在吳佩孚與英帝國主義者幫助之下，陳炯明曾一時佔據廣州。孫中山氏並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日被迫逃亡

。但不久，孫中山氏又收集勢力，戰勝陳逆炯明。不過南方政府過去所屬五省（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因陳炯明倒戈叛變結果，完全陷於解體狀態。陳逆主力，亦未被徹底擊潰，而退據東江威脅廣州，為時甚久。可是孫氏則終於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恢復了廣州的國民黨政權，更加堅決贊助羣衆運動，採取更加澈底的反帝立場，並於這時期內，從帝國主義手裏奪回廣州海關的主權。

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氏為穩定新政策起見，乃於廣州召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正式決議與中國共產黨實行合作，並通過了改組國民黨的各種辦法，使其變為真正羣衆的民族革命組織。因此改組的結果，當時的國民黨便成爲四個階級（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之革命聯盟。

一九二四年冬，廣州發動買辦大商陳廉伯等，在廣州舉行反革命暴動以反對國民黨改組及其新政策。他們有三萬武裝的「商團」，得到英帝國主義積極的幫助；英帝國主義甚至公開表示：倘若國民政府實行以武力鎮壓商團，那末，英國軍隊就不惜砲擊廣州。但是，廣州政府元首——孫中山氏終於不顧英帝國主義者此種威脅，而澈底實行其革命措施。英帝國主義者之公然干涉行爲，更引起廣州廣大羣衆的義怒。一九二四年十月，在廣州革命軍與商團之間，發生嚴重戰爭，雙方激戰，經數日之久；在廣大羣衆幫助之下，由於共產黨員積極的參加，國民黨軍隊完全殲滅了商團叛軍；再過不久，盤據東江之陳炯明殘餘勢力亦被廣州政府完全殲除了。

在這些戰役中，黃浦軍校起着莫大的作用。因廣東革命軍作戰勝利的結果，蔣介石底威

望亦日益增高起來。一九二三年，當蔣介石任廣東軍參謀長時，廣東軍在反陳炯明反桂系軍閥各次戰爭中，都連戰皆捷；廣西政權，不久復轉入廣東政府之手。一九二四年蔣介石轉任黃浦軍校校長，他曾參加指揮鎮壓商團叛變與消滅陳炯明殘部等戰役；正由於這些戰役勝利的結果，加以蔣介石又善於利用廣東軍勝利以提高自己個人的地位，及至一九二五年時，蔣介石升任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

因廣州政府軍事勝利的結果，廣州完全成了民族革命運動發展的鞏固根據地。共產黨與國民黨在中國南部，特別是在廣州之偉大勝利，給予全國民眾反帝國主義運動之高漲以莫大的影響，曾給予全國工農運動以莫大的興奮與鼓勵。

十三 北方政局之變化

在這時期內，全國工人運動的勃興，華工運動的發展，除中國南部革命勝利的影響外，北方政局之變化亦有極大作用。在不久以前，直系軍閥向稱雄一時，其實際的首領——吳佩孚，尚為權威無上的北伐將軍。一九二三年，吳佩孚經過四川國會公開地選曹錕為大總統，並步前武力消滅石鎮嵩任何工人的組織與鬥爭；假借「武力統一中國」的名義，在北方進行反奉的鬥爭；在南部則進攻廣州革命政府。

但至一九二四年秋，北方政局大變，由於馮玉祥實行倒戈並聯不作戰的結果，直系勢力大遭失敗，曹錕被迫下野。當時，一方面馮玉祥在華北一帶，組織國民第一軍，完全採取獨立的政治立場，而奉系軍閥一時亦尚無充分實力以窺取北方政權；而另一方面，直系殘餘勢

力，又未完全消滅；因此之故，強固的中央政府，遂無法樹立。臨時革命執政的段祺瑞（日本走狗及奉系代理人）乃不得不拉攏民族解放運動領袖並邀請中山氏北上；並聲言北京政府爲一臨時機關，一切國事，均須聽由國民會議解決。但段祺瑞企圖以軍閥官僚的所謂「善後會議」，代替真正中國廣大衆衆要求的國民會議，孫段談判，便公開分裂；任何協商，均無完滿結果。而在全國各大城市，國民會議促進會的運動，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普遍發展起來。

段祺瑞的執政政府，豈不比過任何軍閥政府民主一些，可是正因為他軟弱無力，且不敢（至少是在第一個時期）公開採用軍閥屠殺方法來鎮壓民族運動，於是便爲工會工作，罷工鬥爭以及國內全部政治生活，客觀上造成了順利發展的環境。民族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之北上，及其在北方各地推行的廣大宣傳工作，以及國民會議促進會運動的發展，非常加增和擴大了各地國民黨的組織。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北方的工作與活動，同樣也獲得了顯著的成績。

十四 孫中山之逝世

適值此時，中國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與世長辭了。孫氏爲謀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奮鬥至四十年之久；首先反對滿清專制，繼而反對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終身長明艱苦的革命工作，把他的身體消磨了。他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死於北京。他一生革命的光榮歷史，特別是晚年的精神和主義，是異常偉大的。他因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及領會十月革命的教訓，在爭取中國民族革命解放鬥爭中，日益堅決依靠於廣大民衆的力量。

孫中山在英臨死時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裏寫道：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時尚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指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自由之經濟，帝國主義下的剝削，將以此以保證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盡之業，移交與能繼承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痛苦。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之國民黨長生權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共商之際，我仍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簽字）

孫中山臨死時所給予其手創之國民黨的政治遺囑，也是充滿這樣的精神。他的革命政策

「聯俄，聯共與贊助羣衆運動及反帝革命」，這便是孫中山底遺囑，也就是國民黨在共尙進行革命鬥爭時的旗幟。可是自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汪精衛等先後叛變革命以來，國民黨已完全改變了孫中山先生的遺教。

第三章 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中的 中國共產黨

一一九二五年之五卅事變

孫中山底不遺餘地死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重新進入特別高漲的時期，前此備受高壓之中國工人階級，在全國政治環境相形頹時，即奮起而作更加積極的鬥爭。

加之，一九二五年初，國內之工業危機十分嚴重，紡織業之生產，特別停滯，工人生活，因而異常惡化，當時的資本家對工人日常生活利益實行慘酷的進攻，結果，工人組織的反抗鬥爭，非常擴大。一九二五年二月十號，上海起而小紗渡日本內外棉紗廠首先發生羣衆罷工，上海其他二十個日本紗廠之工人，亦立即聞風響應，參加罷工人數約達四萬以上。罷工時間繼續半月之久，結果工人獲得局部勝利。四月間，青島，廣州，漢口各地紗廠工人，同樣舉行罷工。五月中旬，上海紗廠工人因資方拒絕履行二月罷工結束之所允諾之罷工要求，重新舉行罷工。罷工要求，多爲經濟性質。

正在這個時候，著名之上海流血慘案，驟然爆發，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亦即以此為起點。五月卅號上海市之工人及學生發喪，在南京路一帶舉行偉大示威，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勞苦羣衆，特別是反對日本監工壓殺中國工人領袖！中國共產黨已領正紅同志。當時，租界英巡，公然槍射示威羣衆，當場死傷數千人，被捕者則約在六百人以上。帝國主義者底野蠻殺戮，立時激起上海全體中國人民的憤慨。自此時起，全國反帝鬥爭，遂進入澎湃高漲的階段。

五卅事變，充分暴露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狰狞面目。「五卅事變，把我國真實情況完全顯露出來，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帝國主義者野蠻殘暴的眞面目，」（見中華全國總工會宣言）。當時上海廣大羣衆之反抗怒潮，如火如荼，高漲萬分。到處舉行集會講演，實行罷課罷工罷市。各廠工人相繼罷工。至六月十二號，罷工工人已達五十萬人。上海商人爲響應工人總政治罷工，亦於六月一號宣佈全市罷市。六月一號所有中國銀行一律停止營業。上海整個經濟生活完全陷於停頓狀態。

上海學聯會，除組織各校學生出發講演並聯合工人團體及各界市民舉行示威遊行外，復派代表到全國各重要城市活動。六月初，爲聲援上海工人學生鬥爭，武漢學生及工人羣衆亦舉行罷課罷工，實行遊行示威。六月中旬，在漢口因英巡槍殺示威工人及學生，罷工鬥爭，更有擴大爲總罷工之形勢。同時，九江示威羣衆被燒日本台灣銀行。而全國各地，如北京，青島，南京，廣州，開封以及其他城市，無不聞風響應，實行同情罷工鬥爭。帝國主義者爲制止和鎮壓上海事變繼續發展起見，立即集中軍艦三十餘艘於上海一帶。

在力爭民族解放，打倒帝國主義，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改善中國工人政治經濟地位等口號之下，工人學生及抱反帝情緒的資產階級份子之英勇鬥爭，蓬勃發展起來。而六月五日在上海成立之工商學聯合會即為整個運動之領導中心。

二 上海五卅事變之發展

中國資產階級很快就退出五卅事變所掀起的民族革命鬥爭。工業資產階級，很快就藉口提倡國貨而要求華資工廠復工；上海工人只得表示讓步，並於六月十五日宣佈華資工廠一律復工。過數日後，上海商人的罷市，亦宣佈停止；而中國商人當時則藉口說，彼等以前宣佈罷市，祇在表示其愛國，表示其對死難同胞之同情，與對慘案兇手之憤怒而已；現因繼續停業，既於彼等利益有害，而對外人利益又無大損失；權衡輕重，故非宣佈復業不可。

民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戰線，削弱了民族解放運動，使五卅事變後所爆發的偉大的民族革命鬥爭，遇到新的考驗。中國軍閥實行幫助國際帝國主義而鎮壓羣衆的革命鬥爭。奉系軍閥派張學良率兵南下，摧殘上海工人學生的組織，禁止一切羣衆的集會與示威遊行，逮捕積極革命戰士以至封閉一切工會。雖然客觀的環境如此艱難，上海無產階級仍完全依靠於自己的力量，英勇繼續反帝鬥爭，堅持奮鬥，計達三月之久。

最後，估計到幾個月來環境的改變，工人羣衆乃不得不使一般的反帝革命鬥爭，轉變到部分經濟鬥爭。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上海職工會方開始與僱主進行談判。結果，上海工人實行了有組織的復工。（日本企業於九月間復工，英國企業則延至十月間，方行復工）。在中

國民革命史上，上海五卅事變實起着極巨大的作用。牠成爲中國無產階級反帝國主義羣衆政治鬥爭的學校。在五卅事變的發展中，中國無產階級表現出牠是最英勇最澈底的反帝戰士，牠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牠日益爭得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領導權。五卅事變使中國工會組織有着空前有力的發展。在事變一經鬧開時，在上海一處，就組織了七十二個職工會，上海總工會亦於此時正式成立，實行領導以後上海工人一切的罷工運動。上海五卅事變對於以後中國反帝國主義革命鬥爭的發展，以及對於廣州革命根據地的鞏固，都有極重大的影響。五卅事變在全國引起了廣大民衆反帝反軍閥的鬥爭。

三 香港大罷工

五卅慘案所掀起的全國民族革命鬥爭的怒潮，在廣州表現得尤其高漲。由於廣州一六二三慘案，乃更促進了這一運動的開展。六月二十三日廣州羣衆爲響應和援助上海反帝鬥爭，曾組織了廣大的示威遊行。當示威羣衆走近沙基一帶（廣州的外國租界）時，沙基租界英巡大批槍射中國示威羣衆。死傷者達數百人之多，爲反帝帝國主義者新的野蠻獸行，有名的香港大罷工在中國共產黨最忠勇的戰士蘇非微，陳延年，鄧中夏，楊啟，羅登賢諸同志領導之下開始爆發了！香港所有的中國工人一律罷工返省（廣州）。罷工工人在國民政府贊助之下，組織了自己的宿舍，設立了自己的食堂，並找到了各種社會工作。罷工工人組織了武裝糾察隊和革命人民法庭，以鎮壓帝國主義和走狗工賊。同時由於廣州工人苦力僕役車夫英勇的罷工與堅決拒絕爲英日人服務，因之所有居留廣州之英人和日人，亦不得不離開廣州。香

港罷工堅持達十個月，使英帝國主義所受損失超過五萬萬元以上。

香港罷工引起全國民衆廣大的同情，各地所有重要城市，實行募捐以救濟和援助罷工工人。同時香港罷工委員會正式成立工人糾察隊，嚴格進行抵制英貨運動，積極鞏固廣州國民政府的地位，繼續促進反帝革命鬥爭之開展，並努力推動全中國的工人運動以至吸收千百萬的農民到革命鬥爭中來。正由於香港十萬罷工工人之支持，廣州國民政府之基礎，大形鞏固。國民政府對於香港罷工工人所給予的贊助，亦使國民政府的威信大大提高。中國各地勞苦羣衆日益傾向和同情於廣州革命政府。

因著名共產黨員之積極參加與領導香港罷工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廣大民衆中的威望及影響，便迅速增長了。

一九二五年夏季之上海香港無產階級的英勇鬥爭，使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內部發生了轉變。在民族革命運動初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曾佔份下，曾是反帝國主義鬥爭最積極參加者。當時鬥爭的主要方式，爲學生之示威遊行與羣衆集會，以及抵制外貨等等。祇是在上海香港總政治罷工之後，民族解放運動，方走上真正羣衆的反國際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上海香港無產階級不惜犧牲的英勇戰鬥，成了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高潮。

四 一九二六年之三月二十號事變

但革命運動之發展過程，並不平衡，一九二五末幾個月以及一九二六年上半年，革命浪

潮辦有一時之降落。中國反動勢力在帝國主義贊助之下，開始了全綽的進攻。山東軍閥張宗昌佔領了上海，取締與解散所有的工人組織。北方各重要工業中心，工人羣衆組織亦遭受同樣的命運，罷工運動趨於削弱了。

當時，北方郭松齡之反奉倒戈，由於日本的積極干預，遭到了失敗，吳佩孚與張作霖重新聯合起來，且實行軍事同盟，共同進攻馮玉祥。當時所領導之表示贊助廣州革命政府的國民軍第一軍。在直奉武力壓迫之下，國民第一軍不得不退出北平天津張家口等地，而暫時在內蒙西部一帶保持自己的實力。吳佩孚在河南亦利用農民紅槍會組織的贊助，擊潰了剛成立不久的國民第二軍與國民第三軍。

但最重要的事變，則爲廣州的三月二十號事變。廣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號，實行驅逐和排斥汪精衛及其他當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逮捕與撤換廣東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人員，以爲撤消所有共產黨員在軍政機關中負責的位置；甚至在右派派系之下，蔣介石且要將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開除出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號蔣介石要將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開除出去之企圖，就是民族資產階級鎮壓革命的第一次最嚴重的企圖』。（見斯大林：論反對派，中文版第二五四頁。）蔣介石在廣州之反革命行動，大大助長了各縣的反動勢力。廣東的地主豪紳高利貸者，到處向農民協會實行殘酷的進攻。

但蔣介石之破壞統一戰線的陰謀，當時並未能完全實現。他當時只能採取了一些限制共產黨活動的辦法。當時，民族資產階級還不敢向無產階級實行分裂。因爲共產黨當時在一切羣衆運動中，佔着完全領導的地位，所以國民黨仍然只得繼續實行聯共政策。經過這一個短

期間的反動時期以後，新的更強大有力的革命高潮，便又接濟到來了。

五 中國革命之性質與任務

中國革命湧澎湃開展起來了。牠的性質和任務如何呢？

斯大林同志關於這個問題，曾給過下列的指示：

「決定中國革命性質的主要因素如下：（一）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統治着中國的財政和經濟；（二）封建殘餘的壓迫，因軍閥制度及官僚之壓迫而更加深重；（三）無數百萬工農羣衆反對封建官僚的壓迫，反軍閥制度，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日益增長；（四）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軟弱無能，牠依賴於帝國主義的勢力，牠發覺革命運動的發展；（五）無產階級革命積極性日益增長；牠在廣大勞苦羣衆中間的威信日益增長；（六）中國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相近。」（見斯大林：論反對派中文版二五三頁）

中國革命生長壮大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帝國主義的統治與封建殘餘的壓迫，完全危害着中國底獨立發展和廣大人民衆生存的需要，因此，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是：一，將中國由國際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使之達到政治上經濟上的完全獨立；二，以革命方法統一中國，解決土地問題，廢除地主土地佔有制以及社會制度中所有的封建殘餘；三，推翻反動軍閥官僚政權，建立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中國革命所有這些基本任務，都互相聯繫着，要真正解決其中任何一個任務，都非同時解決其他各任務不可。而爲要解決所有這些任務，却非鞏固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不可。

口換言之，只有中國無產階級能够領導城鄉千百萬勞動羣衆，戰勝民族資產階級抵抗，打破極在羣衆中的影響，方能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達到的勝利；而這一勝利在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與蘇聯存在的條件之下，又開闢中國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我們現在來看當時中國事變發展的實況。

六 北伐

自一九二六年七月起，中國政治環境發生着很大的變化。有名的北伐，即於此時開始。廣東國民革命軍向北進展，節節勝利，不數月而佔據了湖南，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廣東國民政府之領域，大大擴展，包圍人口至一萬萬五千萬人之多。國民革命軍之部隊，也日益擴充。原有的六萬國民革命軍隊，至一九二七年初，即增至十七萬人了。因爲革命藉以擴充之主要來源，乃是從擊潰的或轉到革命方面來的軍閥部隊，加以優良的政治教育工作，向根缺乏，革命部隊之戰鬥能力及政治水平，當然相當降低了。

然而，因共產黨員及左派國民黨員英勇積極的參加，國民革命軍終於完全擊潰了直系軍閥吳佩孚的勢力。且使有一軍閥（粵方的反動部隊，同樣遭受嚴重的失敗。中國軍閥勢力之覆滅，顯然使民衆（與主戰者）在軍的統治，也遭受到巨大的打擊。而且，因北伐軍之勝利發展，在北方一帶，國民革命軍的部隊，也隨着形成。馮玉祥所指揮之國民第一軍自得援助以後，遂轉守爲攻，由岳維慶所率之國民第二軍，也把吳佩孚在陝西的勢力驅走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號，國民政府由廣州遷都武漢，除上海以外，武漢三鎮（漢口，漢陽

，武昌）爲中國最大之工業政治中心，國民政府之遷都武漢，更加提高了勞苦羣衆的革命熱情與積極。

如果沒有工農羣衆積極的幫助，北伐軍是不會得到勝利的。在反動勢力後方之工人罷工與農民鬥爭，大大便和了北伐軍底進展。同時，勞苦羣衆也利用北伐軍的進展，利用了革命勢力的擴大，利用了當時的民主環境，以便展開爲自己的切身需要的鬥爭，展開爲建立和擴大自己的組織的鬥爭。

七 羣衆運動之發展與統一戰綫之破裂

在國民政府所有的領域以內，到處爆發着強有力的罷工運動。在漢口的外國企業內，工人羣衆用罷工手段獲得了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及組織職工會的權利。同樣，在北伐軍所克服的其他城市裏，工人也獲得巨大的勝利。民族解放鬥爭一般的高漲，擴展到所有中國其他的省份，罷工運動也隨之發展起來。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工人羣衆，都一起加入職工會的組織。如一九二三年職工會的會員爲二十三萬人，一九二六年爲一百二十六萬四千人，而一九二七年則已達二百八十萬人。

農民運動，也日益發達。初開始時，農民多半從事減租與取消苛捐雜稅的鬥爭。及至運動愈向前發展。深入鬥爭的農民羣衆愈加衆多，因而運動亦更加帶着革命的性質。在有些地方，農民直接奪取和分配地主的土地，驅逐地主與高利貸者，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在北伐軍佔領的區域內，農民協會發展得特別迅速。一九二七年三月時，湖南農民協會的會員，已

達數百萬。其他如廣東、廣西、湖北等省之農民協會，亦有極廣泛的發展。當時，在國民政府領域以內，農民協會會員的總數，多至一千萬人左右。

當時，中國共產黨已獲得偉大的成績。黨的組織擴大了，黨的刊物之銷行份數激增了，黨的中央機關報銷數，已達五萬餘份。黨的區省委所出版的雜誌報紙羣衆刊物之銷行份數，亦大形增長。中國共產黨已成爲最衆的黨了。他在中國工農解放鬥爭中的領導地位鞏固起來了。由於廣大羣衆革命的覺醒，一九二七年一月三號，漢口九江的革命羣衆，自動收回了漢口的租界。不久，都這兩次武裝起義失敗的上海工人，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又舉行了勝利的第三次武裝起義，給予北伐軍佔領淞滬區域以直接的影響與援助。

國際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革命顯赫的發展，進行着積極干涉的鬥爭。一九二六年九月，曾有英艦砲擊四川萬縣事件的發生，死者有二百二十七人，傷者約達數百人，帝國主義對於廣州始終實行封鎖的政策，同時並以陸軍的武裝干涉方式，給予北方軍閥以極大的援助。革命運動之向前發展及國民革命軍之佔領上海，使國際帝國主義者更加積極起來。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帝國主義者，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提出高的美敦書，並實行砲擊南京。由於革命偉大的發展以及中國主義的承認，民衆資產階級轉入反革命營壘去了。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實行「四一二」的反革命的政變，他派兵佔領和封閉工會，包圍和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並命令以機關槍向反抗的工人實行大規模的掃射。繼蔣介石之後，廣州國民黨軍閥李濟深，也舉行了「四一五」的政變。蔣介石在南京組織自己的「國民政府」，以與武漢政府相對立，在南京統治區域以內，到處實行屠殺和摧殘工人農民學生以及文化的團體。共

產黨被迫而轉入極端秘密的狀態了。

蔣介石的叛變，結束了中國革命第一階段——廣州階段。中國革命第一階段底特點，就在於牠是全民聯合戰線的時期，民族資產階級贊助革命運動，革命的主要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這是全民聯合戰線的時期，可是這並不是說民族資產階級與革命之間沒有什麼矛盾，而僅僅是說民族資產階級贊助革命，企圖利用革命以達到牠自己的目的；企圖使革命以擴張領土爲其主要的目標，而限制革命的發展。（見斯大林：論反對派，中文版第二五四頁。）

民族資產階級轉到反革命的營壘，並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中國無產階級爲自己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領導權所進行的鬥爭，引起了中國資產階級莫大的驚恐，以至使之最後走上反革命道路。這一階級力量的分化，雖相當的混亂了革命隊伍，可是終於開闢了革命鬥爭更加猛烈高漲的新階段。

八 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中的路線

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中，共產國際的立場如何呢？牠向中國共產黨指示以何種策略路線呢？共產國際在規定其路線時，估計到中國革命之民族的特點。牠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均以中國爲一半殖民地地位的國家作出發點。共產國際估計到在中國主要的壓迫形式爲封建殘餘，以及封建殘餘與帝國主義統治的關係，共產國際並預見到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

革命所必然經過的各種不同的階段。

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中，共產國際會認為：當民族資產階級在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時，當牠不阻礙以革命精神教育和組織工農一衆時，則聯合資產階級會使工人階級與農民力量易於發展起來。在反對強大的敵人，對於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利用甚至臨時的不可靠的同盟者都是必要的。這正是共產國際策略的出發點。但這一點略所要求的。是爲着革命利益利用民族資產階級，而絕對不是使工人階級退讓資產階級的利權。因爲如此，所以共產國際，始終着重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保持工人運動的獨立性，必須最大限度發展羣衆對與爲爭取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而奮鬥。

共產國際已預先見到中國革命第一階段必然會轉入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中，主要對象，是反對帝國主義，且得到民族資產階級實地贊助，而在第二階段中資產階級則退出革命戰綫，同時，土地革命便成爲主要的內容。在中國革命發展過程中，這種階級力量分化的必然性，共產國際是及時預言了中國共產黨的。

正因爲這樣，所以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土地革命運動風暴般的發展，對於中國革命是有決定意義的。共產國際以爲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真正勝利，只有徹底實現爲反帝國主義鬥爭之基礎的農民土地革命，才有可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同志對於所有那些否認農村革命的可能，以害怕農村革命的發展的中國革命份子，曾予以嚴厲的反駁。斯大林同志說：「中國農民底迅速而廣泛的加入革命，則中國反帝戰綫亦將愈爲堅強而有力」。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決議中，又同樣着重指出這個意思。

在決議中說：「現時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完全依靠於土地革命」。

九 共產國際在兩條戰綫上的鬥爭

共產國際爲着自己基於列寧學說的唯一正確路線，而堅決進行了兩條戰綫的鬥爭。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陳獨秀彭述之等等，有着很厲害的機會主義傾向，完全不了解我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是一種暫時的有條件的聯盟。他們不聽共產國際底指示，不向羣衆預先解釋資產階級叛變的必然性，却曲解統一戰綫的策略，說這個策略是專把工農的解放鬥爭，服從資產階級底利益。因此，在有名的三月二十七日事變當中，共產黨並未會同蔣介石以應有的抵抗。在北伐開始後，中國共產黨當時的領導者陳獨秀等，且甘願讓開工與組織工人糾察隊的權利。共產國際對於這些機會主義的錯誤，曾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他並依靠於中國黨內的布爾塞維克份子來進行這一鬥爭。

另一方面，與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問題底立場相反的，還有託洛斯基——季諾維埃夫反對派。他們否認對建軍問題的重大作用，不了解中國土地革命運動的決定意義。他們說：中國革命之所以帶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僅僅是因爲中國資本主義要求關稅自主。因此，託洛斯基——季諾維埃夫反對派，簡直是掩護了中國資產階級地主和軍閥份子的觀點與利益。

託洛斯基——季諾維埃夫反對派，還在中國革命開始的階段中，即要求中國共產黨退

出國民黨，即要求破裂與資產階級的聯盟，同樣也是等於替貧階級和地主份子服務，他們這些要求的實現，祇有破裂革命的勢力而已。

在北伐時期，正當國民黨在某業中的威望空前提高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員如退出國民黨，那就只有所離羣衆，那就恰恰是爲國民黨有派及一切反對份子所玩弄（所有這些反對份子皆是企圖開除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這樣，也只會使共產黨欠却與羣衆的密切聯系，並無法組織工農羣衆與領導工農鬥爭。

託洛斯基主義之特質，在託洛斯基——季諾維埃夫反對派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立場上，清潔的表現出來了。託洛斯基主義完全杜絕中國革命與農民的特點，忽視中國半殖民地地位，忽視土地革命，不了解中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否認偉大土地農民運動之前提，輕視農民作用以及不相信無產階級有領導農民的能力等。

正由於上述國際底「誠實」的談話，方保證中國共產黨取得了異常重要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廣州階段）中與民衆之資產階級實行聯盟，是爲着擴大革命的領土，變爲羣衆黨，取得公開組織無產階級的可能，以及開始接近農民的道路……民族資產階級轉入反革命營壘了，可是牠同時却失掉與廣大民衆的聯系……祇有這樣的正確政策方能獲得這樣的結果，這難道還不清楚嗎？祇有這樣的正確政策，方能提高無產階級的戰鬥力，這難道還不清楚嗎？」（斯大林）

第四章 中國革命第二階段中的

中國共產黨

一 革命中心的武漢

蔣介石的叛變，就是表示民族資產階級轉入了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地主的反革命的營壘，蔣介石的叛變，就是說中國革命已發展到自己的第二階段，已經開始由全民聯合戰綫發展到千百萬工農羣衆的革命，發展到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將更加強和擴大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地主的，反軍閥以及反蔣介石反革命派的鬥爭，（論反對派）

因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結果，中國南形形成了兩個政府，兩個中心——武漢的革命中心與南京反革命中心——對立的形勢，雙方政策，完全相反，南京政府即刻同帝國主義者實行妥協，無情鎮壓反帝運動，而在武漢政府領土以內，羣衆反帝革命鬥爭，却空前高漲起來，南京政府實行與蘇聯絕交關係，而武漢政府，則仍採取更加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親善合作的政策。

在南京政府領土以內，實行摧殘工農組織，到處槍殺領導羣衆運動的共產黨員，而在武漢，中國共產黨却仍熱公開的廣大發展自己的工作；共產黨員加入了武漢政府，農政部長，勞工部長，內務部長均由共產黨員充任，規定了加強廣大勞動羣衆監督政府機關的辦法，例如：對於省代表會議的召集，當時曾有極廣大的準備工作，以便建立民主選舉的政權機關，湖南之省代表會議，並預定於五月二十日召集。

當時，武漢政府統治有湖南，湖北，江西以及河南之一部，同時，武漢軍隊更向北進展，勝利地反對奉系反動軍閥企圖與馮玉祥部……當時馮氏一再聲明他始終是忠實於武漢政府的——會師於鄭州。

中國革命第二階段之主要特徵，就在於武漢政府統治區域的羣衆運動，空前高漲，罷工浪潮洶湧發展，所有工人羣衆幾乎全部都加入了工會，武裝工人糾察隊亦已組織起來，工人鬥爭更容易強迫企業主滿足其鬥爭要求了，農民協會繼續迅速擴大，單在湖北一省，一九二七年三月農民協會的會員爲八十萬人，而在同年五月十五日已增至二百萬人，幾乎到處的農民協會，組織了鄉村的實政機構，革命的農民，自動地開始廢除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度，農民協會在許多地方逮捕農民公敵最惡的地主豪紳，並加以審判，沒收他們的財產等。農民武裝自衛隊亦在許多地方建立起來。土地革命高潮暴風驟起的急漲起來。

二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這種環境之下，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乃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漢召集，（共繼續半月之久）這時黨已獲得偉大勝利，已成爲羣衆的黨，成爲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強大因素。自第四次代表大會到第五次代表大會黨員已由九百九十四人，增至五萬七千九百六十七人，工人同志佔百分之五十三點八；中國青年團團員已增至三萬五千人，其中青年工人佔百分之四十一，青年農民佔百分之三十四；兒童團團員達十二萬人以上；黨的

機關報「新華」週報亦由七千份增至五萬份了，黨領導着包括百萬羣衆的職工會農民協會，在這些羣衆組織中，黨的影響，日益擴大。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完全公開環境中舉行的，武漢國民黨領袖汪精衛，譚延闓，徐謙等均以來賓資格參加開幕典禮，並向大會致詞祝賀以表示國共兩黨親密合作。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舉行於革命鬥爭極端高漲的時期，其任務是在總結過去工作的經驗，指出中國革命今後發展的前途與確定黨在最近年內的任務。大會議事日程第一項，就是討論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所作的中央政治組織報告，經過討論之後，大會指出：在這一時期以內，黨的領導機關，因誤解民族統一戰線之說，犯了不少錯誤，誇大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及革命性，並未充分保障勞動羣衆的利益，在北伐時期黨「並未充分注意到，在革命領土擴大時，必須加強革命的社會基礎」。（第五次代表大會決議）關於土地問題，黨的領導未曾提出激進的要求，因之也就不能鞏固工農的聯盟，以及工人階級在工農聯盟中的領導地位。大會駁斥了陳獨秀機會主義的理論，大會對於中央報告所通過的決議，大部份是與共產國際立場相符的。

第五次代表大會所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大會完全和一致接受了這一提綱，未加絲毫修改。

大會議事日程上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土地問題，大會對於這個最重要的問題，却並未給以明確的澈底的解決，後來不久，根據共產國際之指示，中國共產黨修改了這一個決議，更加澈底地走上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立場。

大會之繼續選舉陳獨秀擔任中央總書記，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陳獨秀是中共發起人之一，而且在這次大會上，又表贊成大會關於斥責他的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於是大會又繼續選舉他擔任最負責的工作。五六大會前及在大會上，曾秋白同志等，曾在理論上進行過反對彭述之，陳獨秀等右傾機會主義政策的鬥爭，可惜這鬥爭未能充分澈底的進行，而且只限於上層同志範圍之內，以致本堂引起全體同志和廣大羣衆的注目和參加，因此也就不能及時地真正的給陳獨秀彭述之等機會主義錯誤以致命的打擊，於是，在後來事態發展過程中，由陳獨秀所領導的黨的實際領導，却使黨遭到了極嚴重的令人痛心的結果。

三 武漢國民黨領袖的右傾與叛變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開幕不久，武漢環境即頓呈惡化。雖於武漢軍隊在北伐前線上，迭獲勝利，尤其是有名的豫南戰役。當時中國共產黨員團長蔣光燾同志等統率所部士卒，奮勇殺敵，卓著戰績，並為革命利益，捐軀疆場；可是武漢的政治環境却日趨嚴重，日趨複雜。國際帝國主義，向武漢進行經濟封鎖，資產階級亦實行各種罷工，於是武漢政府領土內的經濟生活，遂陷於紊亂與破產不堪的狀態，資分衝突，因而更形劇烈，剝削階級對於武漢國民黨的壓迫，也日益加強；而其有重要意義的，則為當時猛烈發展的農民主地革命運動，土地革命強大的展開，使國民黨的小資產階級領袖日益驚惶失措，而終於轉入反革命的營壘。

後方反革命的暴動的發生，更加速了武漢國民黨這一右傾的過程。自夏斗寅部隊叛變後，武漢政府即陷於日趨瓦解的狀態。夏斗寅部乃武漢政府當時用以防止四川軍閥部隊侵入武漢的隊伍，但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夏斗寅却公然接受蔣介石的指示，率部叛變武漢政府，聯合四川軍閥，使四川軍非常容易佔領了鄂西的區域，並共同造成威脅武漢的形勢，為時不久，夏部叛軍，即為共產黨員樂挺所轄軍隊擊潰，而樂挺在北伐戰役中，即以英勇善戰著稱。正在這個時候，在湖南長沙復有馬日事變發生（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在長沙所舉行的反革命政變）國民黨反動軍官許克祥，實行武力解散國民黨左派省政府，封閉工會及農民協會，圍繳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以致大批宗教家領袖百人以上，並組織湖南反動政府。

不久，江西在實際上也與武漢脫離關係，這裏反革命政變，也是在那些與地主豪紳有聯系而為土地革命所驚恐的反動軍官領導之下舉行的。南昌之反革命政變，即為朱培德所組織，他驅逐（殺害）自己部隊中的共產黨員，解散農民協會，禁止共產黨的公開活動，並開始以武力摧殘和鎮壓工農革命運動。

最後，馮玉祥也背叛了武漢政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馮玉祥被任為武漢革命軍的總司令，同年六月初，復被任為河南省政府主席，與豫陝甘三省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的主席，但至六月底，他却同蔣介石完全妥協了，並堅決要求武漢國民黨領袖實行反共的政策。

因經濟危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深刻階級矛盾的壓迫，因反動軍官先後叛變與暴動的影響，武漢國民黨領袖開始日益動搖起來，武漢國民黨日益顯赫由贊助勞動工農羣衆而變為反

對工農羣衆的力量了。武漢政府對於許克勤、朱山德的叛變，不僅沒有給以任何的訓戒，反而走向這些反動軍官投訴的道路。

自一九二七年五月底起，武漢政府即頒佈保護佃戶階級與限制工農團體活動之各種法令，限制軍隊中政治部工作之特別法令，同時湖北兩個最大的縣農民協會亦被武漢政府所封閉，但所有這些步驟，當然不僅沒有阻止反動份子之進攻，而且更助長了他們的反動。

在七月中旬，武漢國民黨領袖已完成其右傾的過程，公開發佈他們與共產黨破裂宣言，從此以後，在武漢便形成極端反動的局勢，一切革命信譽團體，工農學生團體，盡遭取締與摧殘，共產黨員及大批先進青年遭受屠殺，武漢國民黨的領袖完全走上了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的南京政府實行聯合的道路。

四 武漢時期中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與左傾

在中國革命第二階段中，共產黨的任務，就是在於利用自己在羣衆中廣大的影響與參加武漢政府的機會來盡量發展土地革命與最大限度的開展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共產黨人應當爲轉變武漢政府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而鬥爭。共產國際正是基於這原則，對於中國共產黨發出自己的指示，在國際執委第八次全體會議（一九二七，五月）的決議中曾說：「目前的根本任務，就是要發動千百萬農民來自動從下層用（平民）革命方法解決土地問題……必

須迅速，勇敢而堅決執行武裝工農羣衆政策。」

但是中國共產黨當時的領導者——陳獨秀、彭述之、譚平山等，並未遵照這些指示，却公開採取了機會主義的立場。當時他不備沒有去盡量發展羣衆運動，反而遷就國民黨及反動軍官的壓迫，實行阻止羣衆的鬥爭；不僅沒有反對反而贊助武漢政府關於限制工農團體活動的各種措施；不僅沒有利用共產黨員參加政府的機會以組織羣衆實行土地革命的鬥爭，以及樹立民衆與政權機關的聯系，却反而把共產黨參加政府，當作官僚政客上層拉攏的手段；他們祖護了開始右傾的武漢國民黨之反工農的政策。

中國共產黨中央陳獨秀、彭述之，譚平山等之機會主義之領導，不僅未曾設法武裝工農，反而在武漢國民黨領袖開始動搖時，即公然決定自動解散所有武漢的職工會的糾察隊，並自動解除武裝。當時本該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那樣，「吸收那參加土地革命的農民和革命工人來編制許多可靠的軍團……」並使其成爲武漢革命政府的支柱。可是陳獨秀彭述之等機會主義的領導，則採取了投降政策，不僅沒有加強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勢力，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勢力，甚至對於長沙許克祥的叛變（馬日事變）和南昌朱培德的叛變，以及其他地方所發生的叛變，陳獨秀、彭述之等機會主義的領導，也都未曾採取任何抵抗的步驟與方法。且爲表示自己忠實武漢政府起見，陳獨秀譚平山等，且實行禁止農民自衛軍對於反動軍官所進行的英勇戰鬥爭。

中國共產黨當時的領導人陳獨秀、彭述之，譚平山等所犯的深刻的右傾機會主義性質的政治錯誤，乃成爲中國革命失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但在另一方面，在這～革命時期中，托

洛斯基——李諾維埃夫反對派所積極宣傳的觀點與口號，也絲毫不減於這一右傾的危險。武漢時期剛一開始，反對派即重新主張，中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並提出立刻組織工農蘇維埃的口號；但實際上，這一口號，就是推翻武漢政府的口號；而武漢政府當時還是革命政府，如繼續擴大開展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比方在武漢政府勢力所及的範圍內，現在就組織工農代表蘇維埃——那就是說達成兩重政權，提出推翻左派國民黨而建立新的蘇維埃政權的口號；（史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即刻組織蘇維埃的要求，正是一種冒險式的向前跳躍的要求，就是說要進行反對武漢國民黨革命政權的鬥爭，而這正是蔣介石所希望的，也正合乎他的利益，因為他正巧企圖推翻武漢政府與打破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的合作。

五 史大林同志與中國革命

在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上，在共產國際反對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與「左」的錯誤的鬥爭上，史大林同志起着極大與顯著的作用。根據中國革命之實例，史大林同志在理論上發展了和充實了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乃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之組成部分學說。

史大林同志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給了極端確切的分析；他指出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與封建殘餘的統治有相互錯綜的關係，這個指示對於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異常重要的，他指示了中國革命反對封建任務反帝任務互相密切關連的聯系。

史大林同志且根據中國特殊環境而非常明白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兩個巨流及其發展的階段。史大林同志曾說：「誰不懂得任何革命都有其發展的階段，誰不懂得中國革命在其發展中，經過了三個階段；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得中國問題。」

史大林同志，在爲唯一正確的列寧主義路線之純潔性而推行的兩軍對線鬥爭中，根本粉碎了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與取消派的反革命的批洛斯基的思想。

史大林同志在理論方面對於反帝統一戰線的言論以及在其他策略問題上的言論——如關於軍事因素問題，關於革命軍隊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具體鬥爭道路問題，關於共產黨的建設問題，關於蘇維埃問題，以及關於中國革命前途及其非資本主義發展的諸路問題——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內千百萬勞動羣衆在其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鬥爭中，在其爲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

史大林同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著作與言論，乃是對於馬克思列寧革命學說寶庫的最珍貴的供獻。不深刻研究史大林同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切著作和言論，要想研究中國革命問題是不可能的。

六 中國共產黨之八七會議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給了年卅而未充分成就的中國共產黨克服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與「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以巨大的幫助。中國共產黨之八七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布爾塞

維克化的事業上，作了一個偉大的進步的步驟。一九二七年八七緊急會議，是根據共產國際的要求，背着陳獨秀及其他機會主義領導分子的意志而召開的。八七會議，異常嚴勵地清算了過去領導機關陳獨秀等人機會主義的政策，認定他是公開的取消主義的路線。

在八七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中說：「我們歡迎共產國際之堅決的干涉，正因為共產國際堅決干涉的結果，我們才得以揭穿以前中央領導機關錯誤而挽救我黨於危急，我們堅決指示以前中央所執行的機會主義的非革命的政策，我們認為必須根據過去的教訓來根本改變黨的政路綫。」

八七會議認為：以前陳獨秀、彭述之等所領導的中央，不僅執行了極其錯誤而使中國革命遭受失敗的政策的結果，執行了自動取消與實行投降的路綫，而且堅決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與國際領導機關的指示，他們甚至自動取消國際的紀律與義務，敢於不向全黨公佈共產國際的決議與指令，使全黨無從了解問題與表示自己的意見。八七會議撤換了過去機會主義的領導，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日寇作爲勞動農工鬥爭的基本核心，他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上，起了歷史轉變的作用。

七 南昌（八一）起義

當八七會議時，環境已十分嚴重，白色恐怖正異常猖狂，由於武漢反動派勝利的結果，已完全被趕入極端秘密的狀態了，武漢國民黨的叛變正是表示中等資產階級以及上層小資產

階級，轉入了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當面。可是工人和農民並未下戰而退，他們並未喪失自己保障與鞏固革命勝利的信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他們以過山多以武力堅持和繼續革命事業的嘗試，而南昌起義，便是這種英勇偉大的嘗試之一。

參加這一起義的，為中國共產黨員龍聚地所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的部隊人數約在二萬以上，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晚上，他們佔領了南昌，他們在解除了當口反動部隊的武裝，沒收了銀行的財產，向南昌資產階級征繳了款項之後，隨即實行南進，企圖奪回廣東。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葉世部佔領湖頭，但十月二日即被迫退出，並被廣東軍所擊敗。賀葉南昌起義失敗之原因，雖由於當時反動勢力的強大，但領導革命部隊南進的指導者之策略上的錯誤，亦為引起失敗的重要原因。

此次運動，並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起義的領導者沒有贊助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却僅提出沒收大地主土地的口號，而結果連這個口號也沒有加以實行。

起義的革命部隊，並未與農民運動樹立聯系，並未發動農民鬥爭與武裝農民，在革命軍所過之地，亦並未毀滅舊的政權機關而另建立新勞動羣衆的政權，正由於這些錯誤（政治領導者認平山因此被黨開除），賀葉南進，便完全帶着軍事動作的性質而終於遭受失敗。

結果，只有幾團殘部衝破了敵人的重圍，這幾團部隊，在朱德同志領導之下，與廣東福建，江西三省邊界上的農民游擊運動，建立了密切的聯系，並成爲以後強大的中國紅軍基本部隊之一部。

八 廣州公社

一九二七年秋，南方一帶掀起了農民起義的浪潮，這些零散的農民鬥爭，只在少數地方獲得較長期的勝利。如在廣東的仁化，農民與農的鬥爭，曾一時獲得了極大的勝利，他們成立了蘇維埃政權，並且實行分配地主的土地。在海陸豐一帶，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三月，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沒收地主土地，毀滅山界，將地主土地及財產分給農民。但是，這些區域裏的農民鬥爭，並不能代表全國的形勢，反革命勢力在各地都團結自己的力量，向著農民的革命營壘進攻；而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爆發了廣州工人的武裝起義——堅持革命所得勝利的是強英勇的企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間，在革命軍委員會底英勇主席張大富同志領導之下，廣州工人的武裝隊伍與當時轉變到革命方面的教導團隊伍，在廣州開始了革命的起義，起義集會佔領了廣州之後，隨即宣佈成立蘇維埃政權，在廣大的半殖民地國家內，蘇維埃政權的旗幟，便第一次變為實際行動的口號。

廣州公社，雖然存在不久，雖然經過約三晝夜英勇抗戰之後，就遭受失敗，可是牠已在全世界面前，正式宣佈了中國共產黨之真正革命的綱領，牠領導了許多根本改善工農羣衆生活的法令；牠頒佈了關於八小時工作制，提高工資，關於無代價沒收地主土地轉交給農民，關於廢除一切苛刻債務租契等等法律。

蘇維埃一成立，便由監獄中放放出三十名以上的政治犯，便着手組織紅軍，便着手沒收軍閥的房屋與財產，分配給城市貧民，以及對於失業工人實行國家救濟辦法等等。

廣州公劇的世界和平主義，正如六月國際世界大會決議中所說的：牠是「中國革命」新的蘇維埃階段的旗幟」。但廣州公社武裝起義並未開闢新的革命高潮，反之，牠本身正是在革命力量實行綏退却的時候，在革命浪潮下降的時候產生的，廣州起義的失敗，正如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決議中所說的在客觀上成爲中國革命「退兵時的一戰」。

雖然廣州起義的工人兵士，進行了極端卓絕的英勇的鬥爭，可是中國軍閥在帝國主義幫助之下，利用自己優越的兵力，終於把廣州公社鎮壓下去了，同時，領導方面的缺點，尤其是沒有充分向勞動羣衆實行事前的政治動員與選舉蘇維埃政權機關，同樣也是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

廣州公社存在的時期雖然很短，但牠確是中國革命偉大的收穫，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以及蘇維埃之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政權形式，第一次在中國得到了具體的實現。

自廣州公社遭受摧殘後，最狂暴反動的時期便接着開始了。反動勢力自打敗廣州英勇卓絕的無產階級以後，更加鞏固自己的勢力，更加團結自己的隊伍。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九國際執委第九次全體大會在分析中國狀況時，曾指出：中國工農運動之第一偉大革命浪濤，已形過去。……在許多工業中心裏，因遭受反動勢力屠殺壓迫的結果，工人運動是有相當消耗的。

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體會議，在其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會着重的說：中國黨目前對於不可免的新的革命浪濤，應當進行準備，在現實條件下，應當將作重心，放在爭取千百萬的工農羣衆上面。在政治上教育這些羣衆，以及將他們組織在黨和

黨的口號的根據。又說：「在現時情況之下，最大的危險就是在於工農運動的先鋒隊，曾根據自己對於現時環境的錯誤的估計，而發動敵人的力量，以至於脫離羣衆，跪在資產階級面前自己的力量，而使敵人易於各個的擊破。」

第五章 新革命高潮前的中國共

產黨

一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廣州白晝失敗後，中國所有一般政治情況，正符合於國共執委第九次全會的估計與指示，中國革命之主要收穫盡被反革命取消，貧民運動盡被摧殘，帝國主義與中國統治階級的地位，一時大形鞏固，共產黨之許多地方組織，幾乎完全遭受摧殘，因此，黨與羣衆的聯系，也削弱了。

在這種環境中，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八年夏間，召集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六次代表大會對於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浪潮中的教訓與經驗，作了一個正確的總和與歸納。牠詳細分析了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原因，特別在總揚發了當時中央領導機關之機會主義的政策，大會駁斥了幾個同志之所謂中國革命不斷向上發展的理論。在估計當時一般環境時，第六次代表大會認爲工農運動第一個浪潮，大抵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個浪潮，

已經完結，因為工農受着極嚴重的失敗，他們的革命組織受到極大的摧殘，（工會、農民協會，共產黨黨部），最好的幹部遭受屠殺，工農的先鋒隊遭受很大的損傷，現時的形勢一般的說來，是沒有廣泛的羣衆的革命的浪潮。

但同時第六次代表大會又指出中國革命之新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認為當時已有了一些新高潮的最初的徵兆。第六次代表大會根據這種時局估計，便認為現在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因為歷史失敗而退去了，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反革命的勢力還超過工農，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羣衆。

這一個政治立場，大會在其關於農民運動決議案中，關於軍事工作的決議中，以及關於青年婦女問題的決議案中，更將其具體化了。

在指出黨內有害的傾向時，六次大會特別着重指示說明盲動主義的危險，盲動主義的傾向，使一些黨的組織走上過早的毫無準備的，顯然要遭受失敗的武裝鬥爭的道路。同時大會又着重提出，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危險，並沒有完全剷除，因此，同樣也必須與之作堅決的鬥爭。

其次，第六次代表大會又通過了土地綱領。在這綱領當中，規定無代價沒收地主一切土地，分給農民，並提出土地國有的口號，同時又說明，土地國有口號，只有在全國或首要區域成立工農蘇維埃政權，且獲得基本農民羣衆對於這一步驟的贊助時才可實行。關於黨對農民問題的基本策略立場，大會則決定如下：無階級在鄉村中的主要支柱是貧農，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可是大會對於富農問題，則給了不明確的措辭，以致後來黨的個別負責領導工作

的同志，竟把牠解釋為好似必須取聯合富農的立場。但關於富農問題上的錯誤，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共產國際關於農民問題致中國共產黨的信中，也將其改正了。

在總結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的全部工作時，必須指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當時環境的估計，對於革命解放鬥爭前途的指示，對於黨的重要任務與巨大工作綱領的規定是完全正確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基本立場，在以後不久的共產國際的第六次世界大會上，完全得到了批准中國共產黨根據這次大會的決議，開展了自己的工作，並很快的獲得了巨大的成績。

二 南京國民黨的政策

自中國一九二五——二七一大革命遭受失敗後，國際帝國主義者乘機恢復與鞏固在華已經動搖的統治，在這裏公開投降帝國主義的南京政府，對帝國主義又給了直接的幫助，在大革命時期由民衆奪回的漢口九江的英租界，被帝國主義者很容易的重新由南京政府手中收回去了，漢冶萍公司被日本資本家所佔有了，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帝國主義，又公然出兵山東，佔領濟南和膠濟路。

南京政府依照帝國主義者的指示，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號，與蘇聯切絕了邦交，至一九二七年底，所有蘇聯在中國南部的外交工作人員，一律離開中國，甚至還在絕交以前，在鐵廠廣州公社之後，國民黨一行逮捕打更槍殺收聯廣州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副領事哈里斯同志，即於此時被難。

在革命剛一失敗後，國際帝國主義者，即利用中國國民黨軍閥為其工具，來向中國無產階級生活水平實行最瘋狂的進攻。工人階級在革命時期所爭得的勝利，一律被取消了，過去所定的團體契約，一概宣佈無效了，工資削減而工作時間則特別延長，此外工人的休息與例假，勞動條件方面的改善，以及雇主對於工人待遇上的改善也都被廢除了。

外國資本日益積極佔領中國的工業，在實業方面，外國資本在一九二三年為百分之五四，而一九二八年則增至百分之七二，在五金工業方面，外國資本在同一時間內，則由百分之七十增至百分之九十，在紡織業方面，一九二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外國資本佔百分之五十，而在革命失敗後，外國資本也同樣增長，至一九三〇年時，外國資本已達百分之八十。南京政府雖然完全無法限制外國資本對於中國幼稚工業的排擠，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雖宣佈了暫行新關稅則，可是在這一新稅則裏，入口稅之增加，祇限於次要的物件和奢侈品，而棉紗品，水門口，煤，紙，火柴等，並不包含在內，因之，新的稅則協定，實絲毫不能滿足民族工業發展的需要。

這樣，就使中國工業處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之下，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一年當中，許多工業部門的生產都減少了，甚至有不少企業完全閉門停業，如在一九二九年底，上海一百零六家絲廠都關閉了，幾乎所有的麵粉廠也都停止生產，其它如煙業，火柴業，紡織業，皮業等等方面的危機，也日益加深。

日益深入的農業危機，對於全部國民經濟的惡化，更有極大的影響，南京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聯盟所有的政策，不但未能減弱，反而更其加強這種延綿不斷的危機，苛捐雜稅的

增加與軍閥地主勾結的動向，使中國廣大農民羣衆日益陷於貧困餓死的狀態，飢民災民的數目，日益增加，如一九二七年爲九百萬人，在一九二八年爲二千七百萬，而在一九二九年則竟達五千七百萬人之多。

固然，南京政府企圖裝着國民黨獨立的面貌，其次牠並採取一些無法使人覺得南京國民黨，也是在進行改良內政與減輕人民負擔似的，例如牠曾高喊什麼取消不平等條約；而帝國主義者當然不管牠喊得如何漂亮，其更加鞏固其在華的統治。此外牠還起草什麼土地法勞動法等，而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具體實現，南京政府所玩弄的這些把戲，結果統統失敗而破產了。

統一中國的任務，南京政府也沒有解決，固然，一九二八年六月，南京軍隊佔領了南京，表面上看來，南京政府已成爲全國的政權；然而在這事實上真正的統一，並沒有成功，實際的政權，仍爲各省軍閥所把持，其種種軍閥割據的局面，仍與過去各省各軍各自爲政的制度一樣，中央政府自然無法干其政權。

軍閥混戰亦的連續破壞全國政治的進步，中央與奉系的戰爭，於一九二八年夏，方告結束。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間，又有蔣介石與桂系的戰爭；一九二九年九月，又有蔣介石與張發奎的戰爭；一九二九年十月，蔣與張戰爭，又正式爆發；同年十二月，又有蔣介石與石友三唐生智等的戰爭；及至一九三〇年春，大規模的蔣與閻的戰爭；復重新爆發，所有這些事實，都充分證明中國反革命內部的危險在增長着。

三 中東路事件

國民黨軍閥，武力強奪中東鐵路的冒險行爲之遭受完全失敗，更加速了中國反動勢力瓦解的過程。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在國際帝國主義的逼迫之下，國民黨軍閥實行以武力強佔中東鐵路，撤換與逮捕大批蘇聯的鐵路工作人員，中東鐵路本是蘇聯財產，而且蘇聯早已把牠變成純粹經濟性質的企業，根據一九二四年之中蘇協定（此協定乃中國第一次按完全平等原則及由蘇聯儘量尊重中國人民利益而簽定的信約，而是唯一的平等條約）蘇聯政府更自動吸收中國政府來和蘇聯共同管理中東鐵路事宜。

可是，中國軍閥却公然違反中蘇協定實行無端挑釁，強佔中東鐵路；雖然如此，而蘇聯政府却仍用盡一切可能以求達到和平解決，但是國民黨軍閥並不停止其反蘇聯的行動，最後，蘇聯之紅軍遠東特別軍，乃不得不給與國民黨軍閥以嚴重的打擊，而使之不得不恢復衝突以前之中東鐵路原有情況。國民黨軍閥因受帝國主義愚弄而企圖強奪中東鐵路的結果，遂更喪失其在廣大民衆中間的威信，而中國工農羣衆之積極性，則因中東路衝突之發生而更加提高了。他們以罷工示威（如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及「八一」紀念日上海兩次偉大的示威），表示出中國勞動羣衆對於蘇聯的同情。

第六章 新的革命高漲與爲建立

蘇維埃的鬥爭

一 工農運動之高漲

中國反革命勢力之一切內政外交政策，都遭受破產，資產階級地主聯盟，不僅未能解決——甚至未能絲毫減弱產生中國革命的任何一个矛盾，國際帝國主義不僅沒有放棄，而且更其鞏固和加強了牠在華的特權與統治，中國仍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中國軍閥制度依然保存其勢力，土地問題亦絲毫沒有解決，廣大民衆仍然與以前一樣，也在絲毫沒有權利的地位。

反革命的南京政府，加強了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殖民地的利用和軍閥地主對於勞苦羣衆的強盜的掠奪，結果，中國經濟完全陷於破產的淵淵，廣大民衆更加遭受窮困破產，同時階級矛盾亦日趨緊張，於是，新的革命高潮，便必然發展起來。

工人運動很快就克服了自己在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失敗後，所有的消沉狀態，尤其是自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起，罷工、罷市、罷市、罷市，顯著的復興起來。一九二八年，罷工工人，約近四十萬，而一九二九年，却已增至七十五萬，最近，罷工運動尚多帶經濟性質，但工人罷工鬥爭越向前發展，則其政治色彩，便愈加濃厚，要求釋放被捕工人領袖，要求解散國民黨工會，要求組織工會的自由，有人提出反對國民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等等的口號，便一天的增多了，在一九二九年勞動節時，上海約有五萬工人，參加五一罷工，而在同年八一

國際反戰日，則有十萬以上的工人，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與領導之下，在各地舉行遊行示威。至一九三〇年，工人罷工鬥爭，更繼續發展，並更加帶有持久堅持及有組織的性質。

不僅城市的工人運動以此，而且農民運動亦開始高漲起來，承福有困和饑饉填胸的中國農民羣衆大批走上無地主資產階級統治武裝衝突的道路，農民游擊運動湧澎湃，一天高漲一天，中國工農紅軍之最初隊伍，亦先後形成，而且屢戰皆捷，在游擊運動相當繁盛的地方，蘇維埃區域亦建立起來了。遠在一九二七年，徐陸豐之農民羣衆，即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地主政權，並解除其反動武裝。而建立了存在數月之久的中國第一個蘇維埃區域。海陸豐蘇維埃政府的領袖，即爲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最著名人物，農民羣衆所最愛戴的領袖澎湃同志，他於一九二九年被蔣介石秘密槍斃於上海。

當托洛斯基派聯合右傾機會主義的叛徒們——陳白秀派拼命進行反對共產黨的鬥爭，當着他們高喊中國革命死亡與無產階級地主統治長期穩定之時，英勇的中國共產黨則高舉革命的旗幟在極端秘密環境之中，教育和準備廣大羣衆走向新的偉大的決鬥。

在建造中國紅軍的事業上，毛澤東同志，朱德同志，彭德懷同志，黃公略同志，澎湃同志，方志敏同志，以及賀龍林彪等同志有着特別偉大的功績——他們真是英勇卓絕的戰士，不折不扣的布爾希維克，他們不惜任何犧牲與艱苦，他們無時不爲共產黨的事業，爲全中國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奮鬥。

毛澤東、朱德、方志敏以及現時中國紅軍幾十個有名的智勇雙全的軍事將領，同全黨一起並站在全黨的最前線，經過了中國近十年來，中國所有革命鬥爭火焰的鍛鍊，他們在革命

的時期，在大革命時期，會動員與領導羣衆向前衝鋒陷陣；同樣在革命低落時期，在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暫時失敗以後，在異常困難的時期，他們則領導羣衆作有組織的退却；他們與羣衆一起，並站在羣衆面前，經過了殘酷的階級鬥爭的學校，他們才真正不愧稱爲大無畏的赤胆忠心的戰士；他們用盡了自己的心血，以準備羣衆走向新的革命高漲，因此毫不奇怪的，正是毛澤東，朱德，方志敏以及其他許多忠勇卓絕的布爾希維克，都成了發展勝利的中國蘇維埃運動最初的組織者與領導者。

他們團結了廣大勞動羣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中國反革命勢力的武裝鬥爭，他們創立了中國工農紅軍最初的隊伍，他們知道中國紅軍是民族革命的可靠的與不可擊破的支柱。他們努力擴大紅軍的隊伍和鞏固紅軍與廣大民衆的聯系，在他們精明老練的領導之下，中國紅軍在無數次鬥爭中，經常獲得偉大的勝利，創造永垂不朽的奇績。毛澤東，朱德，方志敏等乃真正全中國人民所公認的民族英雄，他們偉大的奇績，雖敵人亦無敢否認者。

中國紅軍的基本核心，爲當時的紅四軍，一九二八年他在毛澤東和朱德兩同志直接領導之下，初在江西井崗山一帶重要區域裏活動，不久即乘勝東征，佔領贛州西部。一九二八年冬，領導平江起義之彭德懷、黃公略同志，率領所部戰士，於井岡山與紅四軍部隊匯合，彭德懷同志被任爲新成立的紅五軍軍長。彭德懷同志在以後無數次戰役中，成爲中國紅軍英勇善戰與智勇雙全的偉大領袖之一，中國紅軍就是這樣逐漸壯大與鞏固起來的，其英勇善戰的將領，就是這樣取鍊出來的，一九二八年紅軍人數約近一萬人，而在一九二九年，則已增至兩萬二千餘人了。

一九三〇年初，已有十九個蘇區，每一蘇區，由一縣至四縣不等，在蘇維埃區域內，到處實行土地革命與武裝上農，中國中部南部各省，自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已培植下革命根基，蘇維埃運動之成功，特別顯著，至一九三〇年五月，中國共有紅軍十三軍，約六萬二千人，而且大半戰士，皆攜帶有新式槍械。

二 立三路線與四中全会

工農運動之鬧而高漲，向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極其複雜的任務，黨在這個時候，已大大的鞏固了自己隊伍和黨與羣眾的聯系，一九三〇年一月，黨員已增至六萬五千五百二十八人，全黨之思想水平，亦已提高，黨克服了脫離工農羣眾的冒險傾向，同時，又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以及對自己隊伍中悲觀失望的情緒，以及對於革命失敗而灰心喪氣，火火革命前途而轉到取消立憲的份子。在中東路事變當中，黨進行了巨大的擁護蘇聯的運動，具體表明了自已的國際主義的精神，以及對於工人階級之革命任務的正確的認識。

直至一九三〇年夏季以前，中國共產黨基本上進行了正確的路線，並在各方面都獲得了巨大的成績，可是一九三〇年夏季，當革命鬥爭開始高漲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則被李立三路線——與共產國際路線完全相反的路線——所暫時統治了。李立三之整個立場，完全以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同時很快成功的前途為依託，他使說全中國革命形勢已經到處成熟，於是就引導黨來到組織武裝起義——連主要中心城市也在內，結果也只是釀成完全冒險的盲動。

李立三認為革命立刻就會在全國範圍裏勝利，因之他就完全忽視工農日常的鬥爭。他藉口準備武裝起義而解散職工會，說在武裝起義的時候，那裏還需要職工會的組織。其次，他又實行取消游擊戰爭的方針，認為游擊戰爭的鬥爭，已經是過去的階段。此外，他還向蘇區領導同志發出組織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禁止自由貿易及土地買賣的指令。

立三路線的實行結果，給黨以很大的損害，黨與羣衆聯系是削弱了，革命職工運動，特別遭受嚴重的損失。而且李立三公然隱蔽共產國際底立場，不讓全黨同志知道以實行其反共國際的路線。這樣的情況，當然是不能長久保持的。上海黨的組織在陳紹禹（王明）同志領導之下，首先開始了反半托洛斯基的李立三路線的鬥爭，爲正確路線而進行的鬥爭，獲得了完全的勝利。在紹禹同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有威望和最有天才的領袖之一，周圍團結了黨的最好的幹部，他協同黨內其他優秀的領導者，——蔡邦靈，王家祥，何卜述（於一九三三年因遭受虐待病死於北平陸軍監獄內）沈澤民（因積勞成疾而死於鄂豫皖蘇區）陳原道（於一九三二年被國民黨密河槍殺於南京）等同志，在兩條戰線鬥爭上，堅持了正確的路線。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路線，可是，因爲三中全会（一九三〇年九月）採取了調和立場的結果，黨在當時，還未能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再過不久，在擴大的四中全會上（一九三一年一月）黨中央底政治路線，即已完全糾正了。四中全會，革新了黨的領導，揭發了立三路線反列寧主義的實質，同時又堅決排斥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要黨走上失敗選却這路的企圖。四中全會在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的事業上，起了極大的作用。

三 中國紅軍勢力之增長

因為共產黨本身日益鞏固的結果，蘇維埃運動便獲得了新的偉大的勝利。中國紅軍，擊破了國民黨軍對於蘇區的第一次「圍剿」。這次「圍剿」開始於一九三〇十二月，參加圍剿的部隊約十萬人。至一九三一年一月間紅軍即擊潰了南京五師部隊，使所有參加「圍剿」的國民黨的部隊，不得不倉惶退却。一九三一年四月，國民黨的軍閥又開始進行第二次進攻。雖然國民黨的「圍剿」部隊，有其數量上技術上的絕對優勢，但中國紅軍在勞苦羣衆英勇奮鬥之下，又將「圍剿」衝破了。

當紅軍反對敵人「圍剿」的軍事動作時，蘇區內部同時進行了殘酷的肅反鬥爭。到那時候在蘇區內建立了自己的反革命組織（如A B團，軍反布爾塞維克團等），他們混入蘇維埃職工會以及黨的機關裏面，以企圖從內部來進行其反革命的活動。一九三一年在許多蘇區內，都發現了這一反革命的組織。中國蘇維埃在中共領導之下，完全打破了這種內部的反革命勢力。因肅反勝利的結果，蘇區的勢力及地位，更大形鞏固與強大了。特別應當指出，在肅反的偉大的勝利中，發展同一——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領導者，是有很大功績的。

因中國紅軍作戰勝利的結果，蘇維埃政權的領域，遂大形擴大了。紅軍本身也長成強大的力量。一九三一年，正式紅軍，已約有十萬人，其次，赤衛隊，也有約近十萬人的組織。而蘇區九十萬農青年，已都加入了軍事性質的青年組織，即少年先鋒隊。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日本帝國主義者開始了侵佔東三省的行動，在帝國主義奴役瓜分中國史上，開闢了更

新的一頁。

四 日本之佔領東三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開打了牠的強盜掠奪的戰爭。幾天內，日本軍隊就把東三省所有一切重要中心城市佔領了。結果，日本帝國主義併吞了超過其本國面積一倍半的領土——東三省。牠使東三省三千萬中國人民淪於殖民地奴隸的地位。至於日本帝國主義實行軍事進攻的表面上藉口，是非常易於找到的。還在一九三一年夏天，日本帝國主義者即挑撥了流血的韓案和萬寶山慘案。不久，又有所謂中村失蹤案的發生。最後在日軍開始掠奪戰爭時，則更捏稱會有中國士兵毀壞南滿鐵路之事實，日本帝國主義者，藉藉口所謂保護日人權利及維持秩序，而佔領東三省了。

所謂這些表面上的理由，顯然是無關重要的。日本佔領東三省的真正原因，實與日本地主資產階級之一般帝國主義侵略計劃相聯繫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佔領中國東三省，其目的在藉以擴展其在亞洲大陸的勢力，欲利用東三省以作爲自己的軍事根據地，以便繼續進攻中國，以便加強太平洋上以至在全世界上的地位。

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強暴侵略，並未遇到中國軍閥方面的抵抗。自強佔東三省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更覺得寸進尺，乘機北上，進襲上海。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帝國主義迫令中國當局解散反日團體，鎮壓抗貨運動，並於一月二十八日實行以武力進佔上海。

爲回答日寇野蠻的佔領，抗日怒潮，遂在全國各地普遍高漲起來。濟陽及鞍山之總罷工

、上海日本紗廠工人之總罷工，以及全國各地之罷工罷課反日示威等，都明顯證明，無產階級及全體中國人民之擁護祖國完整獨立的鬥爭決心，是如何偉大。

同時，東三省之游擊運動，亦澎湃澎湃，普遍發展起來。參加游擊戰爭的羣衆，日益增加，且一天天給予日寇以新的困難。自上海方面，因工人學生及廣大民衆與十九路軍官兵英勇抗日，舉國矚目，致使日寇無法佔領上海。祇因南京國民黨軍閥之出賣投降等訂滬甯協定，日寇的剝削目的始行達到。

可是，無論南京政府如何多方摧殘與壓迫，而反日運動則仍繼續向前發展，城市小資產階級又被吸收到反帝戰綫上來。北平上海南京，南等處學生羣衆，組織了偉大反日反國民黨的示威，尤其在南京城內，而下示威運動特別激烈，示威羣衆燒毀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機關，並燒燬了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館。

五 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中國蘇維埃運動，在全國這樣條件之下，獲得了特別顯著的勝利。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紀念節），在江西瑞金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此以前，英勇紅軍擊破了蔣介石軍隊之第三次「圍剿」。此次「圍剿」開始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日，當時蔣介石動以三十萬南京軍隊，向蘇區進攻，蔣介石參謀部以及在該軍每一部隊裏，均有德國軍事顧問，指揮助戰。然而此次戰爭結果，紅軍又獲得最大勝利，南京部隊，遭受極大慘敗。被紅軍擊潰部隊，有十七師之多。紅軍所奪獲之機槍，共計二萬五千枝。在蘇大會開幕時

，紅軍槍支已增至十五萬支以上。

在第一次蘇大會時，中國蘇維埃運動所普及之領土，共計三百餘縣，包含人口已達幾千萬人之多。參加大會者，有所謂一切蘇區代表，共六百一十人，大會空氣，異常熱烈，其所通過之文件，多含綱領性質，而為蘇維埃共和國政策之基礎。大會通過了憲法草案，土地法，勞動法，經濟政策等極其重要的文件；以及關於紅軍問題，關於蘇維埃建設問題和關於民族問題等等的決議。大會正式選舉了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同志當選為中央政府主席，張國燾項英二同志當選為副主席。

憲法草案規定中國蘇維埃目的如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根本法（憲法）底任務，在於保證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和達到牠在全中國的勝利。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地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的農民羣衆在他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政權」。

六 中國蘇維埃的土地政策

蘇大會在所通過的法令中，明白規定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各方面工作的政策，尤以土地法有特別重要意義。中國的工農民主專政，究竟怎樣實行以革命方法解決土地問題呢？在蘇區已實行無代價的沒收地主及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被沒收的土地，概歸農民分配；取消一切口頭上或書面上封建奴役的高利貸的契約，廢除一切債務（農民與城市貧民對高利貸者

的債務)；一切恢復債務與奴隸關係的企圖，概受革命法令嚴格的制裁。革命的農工會和貧農團，具有自由活動的權利，他們是中華蘇維埃政府在鄉村中實行土地革命的支柱。所有過去一切苛捐雜稅，概行廢除，而代以統一的累進稅；而今後所有一切刑稅貢租，均由富家剝削分子担負。

同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又特別注意於改進農業技術，擴大耕地面積，改善種植方法以及提高收穫等。蘇維埃機關實行選擇優良種子供給農民，組織肥料合作社，發行改良水利與修農具，以及動員羣衆參加收穫運動等。因為實施所有這些辦法的結果，蘇區農民生活，遂大形改善。

第一次蘇維埃大會以前，在個別蘇區裏，在實施土地政策時曾犯過嚴重的錯誤。例如有些地方個別地主竟能多方藉口，照舊把持其原有土地；有些地方，有人藉口保持鄉村無產階級的柱石，而不分給佃農以土地；甚至還有不分配土地給紅軍戰士的企圖；以爲紅色戰士如分得土地，則不願參加戰爭了。此外，在各別區區裏，尚有不容農民開會與否，而用純粹行政手段實行平分土地的事實；在某些地方，甚至有人企圖勉強設立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可是，自第一次蘇大會舉行以後，此種錯誤及曲解，却已日益少見了。

七 勞動法與文化建設

蘇區工人，亦取得極大成績，凡在蘇區境內，到處都實行八小時制；農業工人之工作時間，則另由契約規定；青年工作時間，比成年工人更短，並實行同勞動酬的原則。勞動條件及企業主對於工人的待遇，更非舊時所能比擬，工人工資，有很大的增加，極大部分工人都

加入了職工會的組織。

中華蘇維埃政府爲維護工農利益而實施的各種設施使廣大勞苦羣衆，更其積極參加政治生活，他們的組織性與政治覺悟性迅速增長起來，各種社會團體，亦非常活躍，下層民衆之革命創造性，日益發展。尤其是因爲蘇維埃政府實行解放婦女，與實行各民族勞動者一律完全平權等設施，下層民衆之創造性，當然更其發展了。

蘇區工農羣衆，對於學習方面，表示極大的熱情。教育文化機關普遍設立。例如江西蘇區之寧都縣，在革命以前，小學數目，本來寥寥無幾，而自蘇維埃政權成立以後，初級小學，竟達三百五十餘所，夜校數目，且在五百八十以上，此外還有十三個俱樂部以及許多掃除文盲的小組。

蘇維埃運動之偉大成績與中國紅軍之有歷史意義的東大勝利，使中國在殖民地世界之民族革命運動中，佔着第一個位置。（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決議）。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中國工農所獲得的這些勝利，更加鞏固起來；並且指出了更加改善勞動羣衆狀況的道路。

八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瑞金召開，參加大會代表共八百二十一人，與會來賓約一千五百人。根據大會資格審查委員會之統計，大會代表之社會成份如下：產業工人八人，手工業工人二百四十四人，苦力五十人，店員二人，僱農一

百餘二人，貧農三百〇三人，中農二十五人，小商人學生及自由職業者及其他共六十四人。

在第一第二兩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之間，中國紅軍擊破了國民黨軍閥四五兩次「圍剿」。大家都知道，南京國民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毫不加以抵抗，却集中一切力量以鐵腕中國蘇維埃運動。一九三二年二月，國民黨即開始進行四次「圍剿」；同年秋，又開始組織第五次「圍剿」。但結果，四五兩次「圍剿」統統遭受失敗，而紅軍之實力及威望，則更加增長，蘇區地位，亦更加鞏固。

第二次蘇大會的中心工作，為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的報告。報告人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同志。他把過去幾年來英勇鬥爭作一個詳細的總結，並指出了動員大眾去反對敵人六次「圍剿」的具體步驟。

毛澤東同志在他的報告中，關於蘇維埃和紅軍積極準備抗日的熱情加以明白的敘述；關於蘇區工人所獲得的成績如勞動條件的改善，工資的增加等等列舉了許多顯著的數字；因實行土地革命的結果，農民羣衆的生活亦有顯著的改善，例如農民的收成，一年之內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農民的生活比較國民黨時代是至少改良一倍。農民的大多數過去一年中有許多時候吃不飽飯，困難的時候有些竟要吃樹皮，吃糠泥，現在則一般不俱沒有飢餓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豐足了。過去大多數農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時候，現在吃肉的時候多起來了，過去大多數農民衣服穿得很爛，現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兩倍。

那一種生活，那一種政權，是農民羣衆願意的呢？讓一切國民黨區域的農民羣衆自己答覆這個問題吧！

在第二次蘇大會所選出的中央政府委員中，除其他同志外還有中國革命的老戰士與有名

的政治家，如林祖涵，吳玉章，徐特立，何叔衡等同志，以及中國共產黨最優秀卓越的組織家之一的趙容同志，中國職工運動最老戰士劉少奇同志等。

中國蘇維埃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克服了一切內蘇區經濟落後，連年戰爭以及經濟封鎖而產生的極大困難，在改善民衆生活方面，得到了偉大的勝利，因此，中國紅軍就得到中國千百萬勞苦羣衆英勇的贊助。在二次蘇大會上，毛澤東同志在其報告中曾說：「擴大工農羣衆，以手執武器保衛蘇區與發展蘇區爲自己神聖的責任，而大批的湧向前線去，其中如江西的長崗鄉，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的全部青年成年四百〇七人中，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去了三百二十人，留在鄉間的八十七人，去的與留的成份爲八十與二十之比，福建的上才溪鄉，全部青年成年男子五百五十四人中，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七人，在鄉間的只六十七人，去與留之比爲百分之八十與二十。」

中國紅軍之偉大的勝利，首先就是因爲他獲得了廣大羣衆這樣熱烈的贊助。紅軍之所以強大有力，就是因爲他與勞動人民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紅軍之所以強大有力，就是因爲他是自覺的自覺的紀律所團結一致的革命軍隊；因爲每個紅色戰士都知道他是爲擁護全體人民利益，爲自己血肉相關的事業，爲全國人民之民族和社會解放而奮鬥。最後，紅軍之所以強大有力，是因爲他有共產黨的領導，因爲共產黨員在紅軍及民衆中進行着巨大政治教育工作。正因爲如此，所以中國紅軍，便能以一當百，殺敵制勝，粉碎那數額衆多而技術精良之國民黨軍閥的部隊。

九 福建事變

蘇俄埃區域之鞏固，紅軍威望之增長，乃促進了國民黨軍隊之瓦解。同時，在國民黨軍隊內部，無論士兵羣衆，無論愛國軍官，對於南京當局步步實施抗日政策之違背，亦與日俱增。此種義憤及不滿情緒，在「一二八」抗日戰爭中，已無上榮華，後來則被迫參加「一·二六」戰爭的十九路軍中，曾表現得特別顯著。十九路軍拒絕與中國紅軍作戰，並於一九三三年冬，在福州舉行反對南京政變，而與紅軍訂立抗日軍事協定。

依照協定條件，十九路軍表示願意進行抗日反蔣戰爭，釋放一切政治犯，允許一切黨衆團體公開活動，以及與蘇俄蘇聯訂親善關係等等。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了獨立的「人民革命政府」，並宣佈準備解決土地問題。

蔣介石深恐十九路軍抗日反蔣運動，普及於其別部隊，遂決意立刻設法「解決閩變」。蔣介石一面調遣大批部隊入閩，一面則實行收買十九路軍之個別軍官，結果終於達到了他自己原定的目的，十九路軍，並未給蔣軍以嚴重抵抗，遂於一九三四年初完全遭受失敗。

中國共產黨員，沒有好好利用因閩變而形成的環境，有些黨員，當時顯然還不懂得成立人民反帝統一戰線任務的意義。因此，在對於十九路軍的關係問題上，表示動搖。共產黨輕視了中國紅軍與十九路軍雙方協定的意義，因之也就犯了嚴重的錯誤；紅軍沒有積極的行動來給予十九路軍以及時的應有的幫助，而爲着進行反對共同敵人——蔣介石的鬥爭。爲着進一步瓦解軍閥部隊並使之轉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戰線上來。紅軍對於十九路

軍的這一及時的實際的幫助，完全是必要的。

十 國民黨第六次「圍剿」蘇區

蔣介石自打敗十九路軍以後，遂乘機集中全力來繼續進行反對紅軍的戰爭，實行大規模的第六次「圍剿」。在國際帝國主義者各方面幫助之下，國民黨在反對蘇區的戰線上，集中了七十萬左右的兵力。第六次「圍剿」延長到一年以上。結果，中國紅軍主力，為保存實力計，乃離開江西蘇區而開始英勇的西征，經過廣東、河南、廣西、貴州、雲南等省，進至四川甘肅陝西，在中國西北部開展自己勝利的活動，不管蔣介石花費了怎樣巨量的物力及人力，可是他那包圍與消滅紅軍的計劃，却終於完全破產了。

紅軍主力自開始由江西西征，至與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同志所創導的四川紅四軍團會合為止，共經過八月半之久。在不可想像的極端困難條件之下，中國紅軍作了五千啓羅米達（一萬餘里）的英勇的遠征。紅軍主力在中國人民及共紅軍的最好領袖——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家祥、廖陳雲、彭德懷、林彪、董振堂、劉伯承、羅炳輝等同志領導之下，在西北中，沿途經過無數的戰爭，攻過最大的山嶽，渡過最大的江河，穿過卑弱小道與走過天險絕地，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水垂不朽的長途遠征中，中國紅軍之指揮員與戰鬥員表現了羣衆英勇與光榮犧牲的模範，表明了他們對於中國人民利益的無限忠實。

紅軍在數量上不僅沒有減少，而且在堅持到底英勇奮戰中，大大發展了自己的實力，鞏固了自己的部隊。由於此次西征的結果，已創立更加順利的條件，以便建立更廣闊鞏實的蘇

區，並使紅軍能實行更積極而更靈活的動作，更加推廣蘇維埃運動與成立更多的蘇區。

隨着中國革命力量的增長，國民黨軍閥內部則自趨於瓦解，國民黨區域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日寇更進一步的佔領中國北部，蔣介石為反對日益增長的革命運動，採取法西斯主義鬥爭的形式與方法。國民黨區域勞動羣衆的生活地位，已惡化到萬分。他們對於現在軍閥制度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凡此種種，都必然促進「蘇維埃區域不斷的增长，而且無論中外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勢力，如何聯合抵抗，都是無法制止這一增長的」。

第七章 中國共產黨爲抗日救國

統一戰線而鬥爭

一 日本帝國主義之有加無已的侵略

一方面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有加無已的侵略，另一方面由於蘇維埃運動之勇往直前的發展，在中國便造成了一種新的政治形勢，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變本加厲的掠奪，由熱河而山海關和長城各要塞，由山海關和長城各要塞而「遼東非戰區」，由「遼東非戰區」不斷進攻中國本部各省。牠利用所設立之「冀察政務委員會」與「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名義，實際上已開始佔領北方五省了。

日本帝國主義者將其所已佔領的區域，變成繼續擴大其侵略行動的軍事根據地，牠把牠所佔領的地區以內的中國民衆，陷入痛苦不堪的境遇。牠公開強佔鐵路銀行輪船公司及其他企業等，實行壟斷一切商業貿易，以及強佔中國人民肥沃的土地。牠把牠所佔領區域內的一切中國人民，完全變爲毫無權利的殖民地的奴隸。牠轟炸與毀滅不甘被人征服的中國農民的村落與房屋，牠在滿州國以及在其他佔領區域內所實行的殖民地的掠奪政策，顯然是與中國民族生存利益水火不能相容的。

而且中國所有其他省分，也都有遭受同一命運的危險。日本對華的侵略，使整個中國都瀕於變爲殖民地的危險。因此中華民族目前所遇的嚴重的民族危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有史以來，所未曾見過的。

二 中國經濟之變本加厲的破產

除日寇殘酷的進攻，給予廣大民衆以空前的浩劫之外，則還有變本加厲的經濟破產所釀成的極嚴重的結果。受着世界經濟危機影響的中國工業農業的危機，達到了異常尖銳的地步，只要拿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在世界經濟危機直接影響之下，中國物品價格降落的情形來說說就夠了，例如在這幾年內黃豆價格由每担美金二元三角落至八角三分，絲價則由每担美金六百二十五元降至一百五十六元，同樣茶葉則由四十三元八角落至十二元，雞蛋由十八元五角落至七元六角，棉花由十九元六角落至十元四角，落花生由五元三角一分降至二元。因之，幾千萬農民完全陷於貧窮破產飢寒交迫的地位，飢民普遍於全國，一九二九年中國共

有飢民五千四百萬，至一九三一年，陷於饑餓死亡的難民則竟達七千萬人。

中國一九三五年的收成，比一九三四年減少百分之二十。根據中國銀行統計，一九三五年上半年，上海工廠關門者達二百五十家；中國絲業則因無法與日本人逐絲競爭，幾乎完全陷於停工狀態；如在一九三五年，上海一百一十三家絲廠中，繼續營業者僅二十三家，浙江的絲廠也多半關門停業。對外貿易也是一年一減縮，國家預算，日益虧空，而且預算百分之八十以上，概作軍費支出及償付債款之用，（軍費佔百分之四九，七，而償款償付則佔百分之二十二，六）。

日本的侵略，則更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破產，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整個廣大領土的佔領，已使中國國民經濟更加陷於解體。而且，日本帝國主義者復在華實行傾銷政策，使中國市場上完全充斥了最賤的日貨，他們以廉價收買陷於破產的中國企業，並以自己的貨幣和對外貿易的政策，來更加加深中國經濟的動搖與紊亂。中國近年來所達到的異常驚人範圍的羣衆失業與貧困，顯然是帝國主義，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奴役中國的結果，是封建軍閥制度存在的結果。

中國廣大民衆對於這個問題日益看得清楚了，他們是不能而且不願甘心去當亡國奴的；他們是不會坐視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偉大中華民族，被帝國主義的強盜任意宰割的；年來中國民衆所積極的反帝國主義侵略者及其在華走狗之義憤，已爆發而為革命的怒潮。廣大民衆，一批一批的參加抗日救國的鬥爭，參加爭取中國政治經濟獨立的鬥爭，參加爭取中國人民之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鬥爭；或者抵抗，或者滅亡，或者堅決鬥爭，或者繼續受滯劫——

這是中國廣大民衆現時開始認識的問題。

三 民族解放鬥爭浪潮之汹涌高漲

由於日本的侵略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中國經濟的破壞，在中國便產生了全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的汹涌澎湃的高潮，東三省之反日游擊運動並未因李杜，馬占山，王德林，蘇炳文等抗日部隊的大敗而消滅；在民族英雄楊靖宇，王德泰，趙尚志，李延祜，周保中，吳義成，李華堂，馮文東，李世榮等領導之下正勝利地開展着。「遼東非戰區」之三萬餘農民反日的鬥爭，更是日人佔領區城內農民運動發展的徵兆。同時中國無產階級的罷工運動亦在繼續發展着。

大部分罷工鬥爭，最初雖多帶經濟鬥爭的性質，但在鬥爭過程中，很多都轉成爲政治的鬥爭；而有些鬥爭一開始便帶着很顯明的政治性質。在所有這些鬥爭中，特別重要的有上海老怡和紗廠一萬三千人的罷工，上海法租界四萬人力車夫的罷工，奉天抚顺煤廠二千三百工人的反日罷工，本年（一九三六）一月，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的罷工，引起上海宣佈戒嚴的上海海員壯烈的反日示威（有六十餘人被捕），以及一九三五年末，武漢三鐵之工人參加反日游行示威等。

一九三五年冬與一九三六年春，不顧國民黨當局殘酷的壓迫，學生運動由平津開始而發展到最廣大的範圍，而普及於全國一切的重要的城市，在學生運動高漲的影響之下，城市小市民階級，先進的資產階級文化界以及有愛國天良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積極的起來參加

全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了。

各種各樣的反日團體，如雨後春筍一般，到處產生與發展起來。學生會，各種文化團體，律師公會，記者聯合會，職工會，各界救國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等，一致奮起，反對日寇的侵略，反對南京政府賣國投降的行動。國民黨內部的危機亦日益增長了，對國民黨上層領袖政策，表示失望的下層黨員羣衆，日從感覺到有必要實行抗日的必要，有團結全中國人民一致進行救國鬥爭的必要。

同時，這一反帝鬥爭的高漲，又促進了中國軍隊的革命化，不僅在士兵羣衆中，而且在軍官當中，堅決反日的情緒都在日益發展。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上海抗日戰爭，一九三三——三四年之福建事變，國民黨二十六路軍在董振堂同志領導之下實行革命起義加入紅軍，許多部隊不顧和拒絕進行反對紅軍的內戰，吉鴻昌（中共黨員，一九三三年入黨，在國民黨的屠刀之下，光榮的犧牲了），方振武，馮玉祥，孫殿英等在察哈爾武裝抗日的義舉，在第二十五師，王以哲部以及二十九軍中官兵反日情緒之高漲，西南數十將領的抗日救國通電，在南京部隊的軍營中反日傳單的散發，日益獲得更大的同情，以及中國個別軍事政治派別份子的抗日救國的鬥爭，更加成爲經常的現象等等，都是最明顯的例子。

在所有這些民族解放鬥爭中，充分表現着：團結中華民族的一切力量，爭取中國獨立與領土完整，日益成爲廣大羣衆的迫切需要與鬥爭目標。因此，這便造成了組織中國人民反帝統一戰線——即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特別良好的基礎。

四 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綫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上，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其有歷史意義的報告中，曾說：「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因為國際環境和國內情況的改變，反帝統一戰綫問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一指不對於中國特別具有重要的意義。中華民族之命運，已被日本殖民陷於千鈞一髮的地步，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全境人民現在最主要的死敵。只有動員和團結一切力量，中國人民方能打破日寇強奪的計劃及打退日寇變本加厲的進攻。正因如此，所以中國人民反帝統一戰綫的成立，就成了抗日救國之最要條件，只有建立這樣的戰綫，中國人民方能脫離完全陷於殖民地奴隸的命運。

要知道，因日本野蠻侵略的結果，在中國已形成完全特殊的形勢了。為着反對共同的敵人，各種完全不同的力量，不同的階級利益，甚至完全相反的政治社會趨向，都一致聯合起來。還在歷史上是有不少先例的。即以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的情形來說：「一九一七年特別嚴酷的條件下，乃使各種不同的社會力量都聯合起來，集中火力反對沙皇專制。」（列寧選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十一頁）。革命取得了預想不到的同盟者，「這樣就使革命的爆發，出乎大眾意料之外，我們的同盟者，不僅有俄國的資產階級而且有英美的資本家。」（列寧選集第二十一卷一百七十五頁）。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極大部份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顯然有所改變，他們日益努力尋找抗日救國的道路；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內部各省繼續向前發展

，英美帝國主義的利益，逐漸直接的威脅，於是日本與英法帝國主義者的衝突，亦更加強起來。所有這些複雜的條件，乃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提出了極端重要的任務，吸收所有愛國份子，利用一切直接的間接的後備軍到全民反日陣線上來，以開展整個中華民族的勝利的神聖的戰爭。

經過無數次戰鬥的激練而鞏固擴大的紅軍之存在，大大的便利了全中國人民反日鬥爭之開展，中國紅軍乃是全民反日第一戰線之最可靠的武裝力量。

當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上，講到這個任務時，他曾說：「在中國，因為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在很大一部分領土上，已經建立了蘇維埃區域，組織了強有力的紅軍；同時，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施行強盜的進攻以及南京政府實行無恥的賣國，中國偉大民族底生存，已經到了千鈞一髮的地步。只有中國蘇維埃才能是反對帝國主義收復瓜分中國的鬥爭中的統一中心，只有蘇維埃才能統一和團結一切反帝勢力，來進行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

因此，我們完全贊同，我們英勇的兄弟的中國共產黨提議建立極廣大的統一戰線，與中國領土內一切真正願意救國救民的團體，及個人，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之「其中國走狗」。

五 中國蘇維埃在新環境中的鬥爭

季米特洛夫同志這一指示，在中國蘇維埃面前提出了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任務。中國蘇維埃，原來是在土地革命中發展起來的，中國蘇維埃前此政策之主要內容，是徹底解決土地問

題，沒收地主一切土地，分給農民。因此，在過去蘇維埃區域主要的是土地革命的根據地，而在現時新環境下面，中國共產黨底正確政策，却是要使中國蘇維埃區域，首先就成爲反帝鬥爭的最可靠的根據地，蘇維埃政府，成爲反帝人民統一戰線的引導力量。

同時，爲適應新環境的要求，中國紅軍的領導者，力謀擴大中國紅軍的成份；中國蘇維埃和紅軍的領導者，在同其他部隊和政黨派別訂立協定以及實行聯合共同反對日寇及其在蘇走狗等方面，正表現極大的提倡發起的作用。

同樣，中國紅軍最近的行動，亦以方針爲出發，由英勇善戰的賀龍和蕭克兩同志所指導和在任弼時（中共政治局委員）同志領導之下的二六軍團，由湖南西進而抵達川康，並與名震天下的朱德，徐向前同志等所統率之紅軍主力會合。

同時，紅軍之另一主要部隊（一三軍團），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在林彪，彭德懷等同志領導之下，則由四川北上而進達陝北，與徐海東同志所領導之下紅二十五軍和劉子丹同志所領導之紅二十六軍等取得會合；大大鞏固了陝北蘇區。不久，毛澤東同志復親率部隊，渡河入晉，直接逼近日寇所佔領之區域。所有這些偉大的行動，都如日月經天一般，表明中國紅軍抗日救國的戰鬥決心。而且，爲時不久，毛澤東同志即在晉陝一帶新創立五師紅軍部隊，此種事實，即爲紅軍近來鬥爭勝利及其威信提高之最好證明。

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在共根據季米特洛夫同志報告所通過的決議中，規定中共任務如下：「中國必須把擴大蘇維埃運動與鞏固紅軍的戰鬥力，與在全中國開展人民反帝運動連結起來。這個運動應在下列口號之下進行，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鬥爭，反對帝國

主義強盜，首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蘇維埃應當成爲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團結的中心。這一指示，成爲中國共產黨這一歷史時期全部政策及其所有一切措施基本方針。

六 中國共產黨之新政策

當日本開始佔領東四省時，中國共產黨便立即提出「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以保障中國的民族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之口號。黨在積極開展與領導反帝鬥爭中，進行了極大的工作。黨曾努力組織充滿民族義憤的廣大羣衆，走上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走狗的道路，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的活動並非沒有結果的。而中國共產黨對於一九三三年的（一二八）上海英勇抗日防衛戰爭的積極參加，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激進戰役經過不久，中蘇蘇維埃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向全國一切軍事部隊，發表宣言，表示在三個簡單條件之下：（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二）立即保證民衆的民主權利，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三）允許民衆有組織抗日義勇軍和武裝的自由，願與全國任何武裝隊伍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戰鬥協定。

可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充分估計到政治環境的一切變化，以及階級力量相互關係所發生的變動，所以還沒有在所有策略方面都實行應有的轉變。這在福建事變當中，顯然可以看出，結果，中國共產黨在準備和發展革命民族防衛戰爭的事業上，在動員廣大民衆與建立全民抗日統一戰線的事業上，就顯然沒有獲得應有的成績。

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在中國共產黨策略轉變方面，表現了偉大的作用，在

這次大會上，以王明同志爲首的中共代表團，已將中共的新政策與新策略之基礎充分的發展了，中共新政策與新策略之目的，是建立抗日救國的人民統一戰線，要在中國紅軍和蘇維埃周圍，團結一切最徹底最強大的反帝力量，團結全國廣大民衆，共同來進行抗日救國的鬥爭。

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共同簽名發表的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爲認識應用這個新政策的具體表現。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上，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在這個宣言內，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號召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組織全中國的抗日聯軍，在這個宣言內說：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作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建立即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國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救國會，民族武裝自衛會，反日會，救國會等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

不僅如此，在這個文件內，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且懇切聲稱自己絕對盡力贊助這一政府的建立。並把對執行其一切關於保護中國領土完整與中國人民切身利益的一切決議。同樣，在這個八一告同胞書中，曾提出了下列關於國防政府的行政方針：

- (一) 抗日救國收復失地。
- (二) 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 (三) 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一切財產，充作對日賠償。
- (四) 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糧食，土地，交給貧苦同胞和抗日戰士享用。

- (五) 廢除苛捐雜稅，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
 - (六) 加薪加餉，改良工農學各界生活。
 - (七) 實行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 (八) 實行免費教育，安置失業青年。
 - (九) 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護華僑在國外生命財產居住和營業的自由。
 - (十) 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衆（日本國內勞苦民衆，高麗台灣等民衆）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作同盟，與一切對中國民衆反日解放戰爭保持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係。
- 中國共產黨目前還不過開始實行自己的新政策，因而現時還很難說新政策執行的成績如何，可是有一點是非不清楚的，祇有徹底執行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的決議，祇有勇敢而大膽地實現中共的新政策，才能把強有力的反日人民戰線建立起來，並藉這一戰線來獲得中國民族革命偉大的勝利。

七 中國蘇維埃經濟政策之修改

爲適應中國新形勢與黨的新政策，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蘇維埃的經濟政策，乃有更加確切的規定以至部分的改變。

在土地政策方面，要實行消滅封建殘餘的路線，但同時必須注意並可能建立最大的人民反日統一戰線，根據現有的材料，中共在這方面的決定如下：

(一)對於那些由勞動積蓄得到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雖然他們自己不耕種而將其土地出租，但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並非地主階級，而屬於小資產階級（如自由職業者，教員，醫生，學生，小商人，手工業者等），絕不沒收他們所有的土地，對他們的土地，或者允許他們繼續出租（當然不是在殘忍奴役的條件下出租），或者因農民羣衆要求而將他們的土地拿出來不分明時，國家應當給他們相當的代價報償。

(二)富農的土地及所謂多餘的生產工具，均不沒收。如果在基本農民羣衆要求之下，實行平分一切土地時，富農土地應當也拿出來平分。

(三)一切真正手執武器參加抗日救國鬥爭的軍人的土地，不在沒收之列。

(四)如果商人同時是大地主，只限於沒收他們的土地，不侵犯他們的商業機關。

中國共產黨在工商業政策方面，在蘇區勞動問題方面，同樣亦有許多變更。例如，蘇聯不僅要盡量發展羣衆的合作事業和國家的企業，而且也要用各種辦法去獎勵私人資本投到工商業方面來，並設法幫助和獎勵私人工商業的發展，要取消對於自由貿易與工業發展的限制，要設法發展蘇區的工商業，要修改妨害私人工商業的各種稅則。在提高工人與農物質生活，決權地位和文化程度方針之下，在蘇區內要適量提出一些實際上不能執行的，或者要加強經濟機關與增加工人數的過分要求，以及在蘇區內現時不實行工人監督生產的辦法（在目前蘇區內並沒有具備這樣的條件）等。

中國共產黨將以身作則，在蘇區內最徹底實行國防政府的訓令，表示願爲一切贊成和參加國防政府的黨派的粉飾；可是，這並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在蘇區內的行動，要完全限制於

國防政府綱領的範圍；根據蘇區廣大羣衆之情緒與要求，中共應實施比較國防政府綱領更進一步的辦法；但同時必須顧及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民族解放鬥爭的利益。

八 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區域內的活動

中國現時的政治環境，在國民黨區域內的大產黨組織面前提出極其艱鉅的任務。共產黨員應當消滅民族解放運動中現有的極大弱點，剷除反帝鬥爭中的零散現象；共產黨員應在最短期內，統一現有一切反日團體，並集中反日鬥爭的指導；中國共產黨要堅決改組自己在軍閥部隊中工作，不僅要把廣大士兵羣衆，而且要將軍官爭取到人民反日戰線上來。共產黨員應當同黨在廣大羣衆中的聯繫與影響，應經常揭露敵人，將共產黨爲陰謀小組的企圖。中國共產黨人應爭取合法活動的機會，要利用一切機會來向全國人表明中國共產黨人，是忠實的愛國主義者，是爭取中華四萬萬民衆之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先進戰士。

中國共產黨應力謀實現中國職工運動的統一，加緊進行農民中間的工作，積極領導羣份子，特別是學生羣衆反對賣國漢奸而進行的愛國運動；同時，黨應力求工人農民學生鬥爭的配合與聯繫，應使所有這些鬥爭匯合成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華走狗的全民鬥爭的巨潮。共產黨應組織反對日寇法一具體侵略行動的共同鬥爭，在經過這些共同鬥爭來達到全國人民力量鞏固的聯合，以達到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統一的抗日聯軍的建立。黨應熱情的反對和揭露一切反日人民統一戰綫的敵人和反對者，同時，要絕對履行自己與任何政治派別或團體所訂立的協定，以及努力吸收一切反日勢力，甚至暫時的動搖的與不可靠的同盟者到人民抗

日救國的統一戰綫方面來。中國共產黨人應當最積極參加一切反日運動，鞏固黨在羣衆中的威望，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爲全民利益而鬥爭的最徹底的戰士。

九 中國共產黨底旗幟乃是勝利的旗幟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十五年以來，已經過了偉大發展的道路，已經過了最嚴的考驗。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牠曾準備廣大羣衆去參加這一革命的事業。自一九二五年大革命爆發後，牠又及時站在中國工農羣衆運動的前面，組織與領導了最強有力的反國際帝國主義的光榮偉大的戰鬥。而在中國革命暫時失敗的困難年代中，中國共產黨又學會了實行退却的藝術，牠積聚了自己的力量，鞏固了自己與羣衆的聯繫並準備羣衆去作新的更偉大的衝鋒。中國共產黨所有這些努力，並不是沒有結果的。而且正是中國共產黨準備了一九三〇年開始發展的新的革命高潮，黨深切相信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因之牠爲獨立的強大的自由的蘇維埃中國進行了勝利鬥爭，牠在自己的旗幟之下，團結了中國千百萬的勞苦羣衆。

政治環境日新月異的變化，在黨的面前提出了日益複雜的任務。中國黨研究了本身所犯錯誤的教訓，積聚了最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消除了自己的弱點並在實際行動上改正了自己的缺點，結果便保證了本身在思想上組織上的發展。而在不調和的兩條戰綫的鬥爭中，中國黨在理論上與實際上更其鍛鍊和布爾塞維克化了自己的隊伍。

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在特別艱難的環境中進行自己的工作，幾千幾百的布爾塞維克戰士，在反革命的野蠻殘酷的白色恐怖下犧牲了，爲中國人民事業而英勇犧牲了許多最著名的人

物：有蘇炳徵，向忠發，楊敬，王荷波，劉華，白自吳等這些工人階級最有名的領袖，有自第三次黨大會以後由連任的中央委員，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同志；有著名的黨的領袖與全國聞名的政治家李太符同志；在反革命的屠刀下慷慨就義的，有中國勞苦羣衆的最有才能的卓越的領袖陳延年同志和趙世傑同志；有極廣闊之眼界及極堅定之意志的羅亦農同志，在偉大門爭中英刃犧牲的，有青年團的創造者與濟州公社的領導者張太雷同志和最受中國青年羣衆愛戴的近代英同志；以外慘遭敵人屠殺槍斃而尤榮犧牲的，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和森同志和羅登賢同志；以及中國農民運動偉大的領袖——農民大王——澎湃同志。而在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期，在全國人民必須空前團結自己的一切力量以抵禦日寇的時候，則有爲抗日救國而壯烈忠勇犧牲的方志敏同志及其戰友紅軍第七團，團長潘澤洲同志等等。

中國紅軍創造者之一，白公陸同志，在蘇維埃革命戰線上，爲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光榮犧牲了；中國最受痛苦的婦女，袁之儉秀代表，中國共產黨最老的幹部向警予同志，被國民黨的刀子手所殘殺了；在補救中最優秀的代表，卓越的軍事家，中國共產黨底忠勇戰士，熊雄，孫炳文，李之龍，蔣光赤，以及劉華等同志，亦都先後壯烈犧牲了；而在有名的上海抗日防衛戰中，孫小寶，傅維鈞二同志在湖北前綫上，英勇爲國捐軀了；在東北抗日游擊戰爭中，金伯陽，袁長榮，何思美，李斗文（中共黨員韓國人）等同志英勇的戰死疆場了；此外慘遭屠殺的則有中國回族優秀子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五四時代最有名的學生領袖，我們的馬駿同志；以及在雙重壓迫下的苗族優秀子弟，紅色游擊隊最忠勇的領袖，我們的

章拔羣同志。

近幾年來，不經任何法律手續而遭受反革命劍子手屠殺犧牲的共產黨員，最優秀的中華民族子弟，約在三萬以上。成千累萬的中國共產黨員，真正不愧稱為民族英雄，他們始終堅定為民族利益而鬥爭。在東三省，他們進行反對日偽的英勇活動，在中國紅軍為全中國人民之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事業的光榮鬥爭當中，約有十萬餘共產黨員，忠勇為國捐軀了。

中國共產黨，不顧如何艱難和困苦，始終進行着不屈不撓的鬥爭，她在力謀恢復敵人所給予自己組織的創傷中，鞏固了自己與全黨的聯繫，她學會了如何把為勞苦羣衆切身要求的日常鬥爭與解決歷史的國家重大問題的鬥爭聯繫起來的藝術。她在戰鬥中培植了忠於革命事業的幹部；她有靈心竭力，不惜犧牲生命來為黨的建設與鞏固而鬥爭的戰士；他們永久記着如果沒有這樣牢固的黨，中國人民是沒法求得民族獨立和社會改造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切工作都建築在自覺的基礎上，他們深切了解只有中國共產黨具有真正戰鬥的力量，並與廣大羣衆有着緊密聯繫，乃是中國人民爭取獨立與解放鬥爭中最基本的與有決定意義的條件。中國共產黨吸收一切最英勇的戰士加入自己的隊伍，這些戰士的特性正如史太林同志所說的一樣，具着：「有清楚的目的，有不達目的不止的堅決精神，有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性格」。

中國共產黨受着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太林學說的熏陶與鼓舞，堅信自己最後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因為是照這個學說的指示，並穩穩站在这个堅固的思想基礎上，所以就能正確解決中國民族解放鬥爭一切迫切的問題。他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忠於列寧史太林的共產國際之精神教育，他所領導的偉大羣衆，使之感覺國際無產階級的勝利與自己已有血肉相

國的聯繫。

中國很有名的政治家，在不久以前還是反對共產主義的，可是在其最近的一篇論文當中，却不能不承認中國共產黨實爲中國最優秀青年之精華。固然，在中國黨的隊伍中，是有不少白髮蒼蒼的人物，可是他們也與所有的共產黨員一樣，是屬於前途無量的青年的黨，屬於爲救國救民及改造中國社會而英勇奮鬥的黨，屬於不顧任何犧牲，非達到這一目的不止的黨。

強大的中國的黨，乃是中國人民民族和社會解放鬥爭勝利的最好保證。中國共產黨底旗幟，乃是勝利的旗幟。中國共產黨高舉着這面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走狗的鬥爭的旗幟，力謀全民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實現，一定會贏得全中國民衆更熱烈的愛戴與更偉大的擁護。所有中國人民中忠誠的先進的份子，正一致團結在中國共產黨戰鬥旗幟之下，並一定會在中國英勇的佈爾塞維克領導之下，在最近將來的決鬥中，獲得完全的勝利。

完